

不过如此

当政



大明皇朝

真正的权力生涯

明

张其成讲读

张其成讲读

张其成讲读

最权威的解读 最犀利的评述

——张其成讲读《大明皇朝》——

明一代作事最精、为人物最杰出、政绩最著者

张其成讲读



目录

Content

- [官运亨通的奥秘 \(1\)](#)
- [官运亨通的奥秘 \(2\)](#)
- [官运亨通的奥秘 \(3\)](#)
- [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
- [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 \(1\)](#)
- [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 \(2\)](#)
-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 \(1\)](#)
-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 \(2\)](#)
-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 \(3\)](#)
-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 \(4\)](#)
- [得来还需费功夫 \(1\)](#)
- [得来还需费功夫 \(2\)](#)
-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 \(1\)](#)
-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 \(2\)](#)
-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 \(3\)](#)
-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 \(4\)](#)
-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 \(1\)](#)
-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 \(2\)](#)
-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 \(3\)](#)
-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 \(4\)](#)
-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 \(1\)](#)
-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 \(2\)](#)
-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 \(3\)](#)
-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 \(4\)](#)
-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 \(5\)](#)
-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 \(1\)](#)
-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 \(2\)](#)
-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 \(3\)](#)
-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 \(4\)](#)
- [两利俱存独持其柄 \(1\)](#)

- 两利俱存独持其柄 (2)
- 两利俱存独持其柄 (3)

官运亨通的奥秘 (1)

张居正仕途顺遂，官运亨通，在当时的官场，像他这样如此顺遂、成功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张居正是成功者！

人治官场，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能够一路顺遂，爬上高位，必然有他的诀窍。现在，我要说说张居正这个人是怎样爬上权力高位的。

必需说清楚，张居正的出身是卑微的。换句话说，张居正没有任何的家庭背景可言。考其三代，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有地位的人。如果说有什么身份的话，他祖父的身份是“保安”，父亲的身份是“学生”。

可能需要点解释。“保安”身份其实不难理解。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搞分封，把子孙分封各地，正面说是享受荣华富贵，反面说是形同禁锢。其中，有一个子孙被封辽王，在张居正出生的年代，辽王的封地就在张居正的家乡荆州。张居正的祖父，是辽王府的护卫卒，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保安”啦。

那么“学生”身份是怎么回事呢？这和科举制度有关。明代，进学校是科举的必由之路。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参加选拔举人的考试。而取得生员资格要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统称童试，被录取的就进入府学或者县学学习，通称生员、童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秀才。在学校学习的生员，用现在的称呼，不就是学生吗？

张居正的父亲不甘心做“保安”，更不想当老农民，就想考取个功名，混个官做做。运气不好还是脑子太笨说不清楚，反正他考了二十多年，也只是考中了生员。说他是学生身份，他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你要说他是农民身份，那他肯定不干！因为生员也算是功名的起点了，也算是有身份的人了。所以，说张居正的父亲身份是“学生”，实事求是，绝对真实准确。

可以说，在张居正的仕途上，家庭除了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外，实在没有任何帮助。

排除了这个背景，总体上说，张居正走的是自我奋斗的路子。具体说，张居正之所以能够爬上权力的巅峰，一靠的是制度，二靠的是聪明，三靠的是人脉，四靠的是高超的权术。

我得声明，这四个因素，不是按照重要性排序的。或许，在一定情况下，高超的权术，就是主导性的决定性因素。

先说制度。

前面说过，张居正出身卑微，但是，幸亏他生活的时代恰好是科举最盛的时代，学而优则仕。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那个时候寒门子弟要做官，非经过考试不可。既不能花钱买文凭，考试也很难作弊。作弊倒是有过，恰恰是张居正当国的时候，他为了保证其子能够及第，花钱要未来的作家汤显祖帮忙，汤显祖拒绝了。此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对张居正的声望损伤很大。这是后话。不过足以说明当时取得做官资格，是相对公平的，要靠自己的本事，歪门邪道基本上是走不通的。

张居正的运气不错。二十二岁就考上进士，而且排名靠前，二甲第九名。

科举考试，排名和年龄都很重要。当时的制度，基本上是按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

首先，取得做官资格，取决于成绩。科举考试的起点是秀才；考取秀才再参加全省范围的考试，考中的称举人；再通过全国的考试，最后考中的就是进士。这些考试，都是唯成绩论的。考中进士以后，按照成绩排序，分三甲。一甲三名，即我们平时说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从第四名开始至100名左右，其余者统称为三甲，约200人左右。

官运亨通的奥秘（2）

其次，分配工作也取决于成绩。换言之，进士的分配，是根据他们的排名进行的。每次新科进士出炉后，要分配工作，叫“大选”。一甲、二甲、三甲，三个等级的进士各分配什么工作，差不多已是惯例，做手脚的余地不大。排名靠前的，你想给他安排差的工作，很难办；排名靠后的，老爹是高官，就想超过前面的，也很不容易。

不过，张居正没有直接参加分配，而是进一步深造了。

按照制度，进士出炉后，还可以参加甄拔庶吉士的考试，年轻而且名次靠前的，有优势。张居正因此而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翰林院是研究机构，在里面工作的人被称为“史官”。如果张居正直接参加分配，那么在中央，可以到监察机关当“言官”，也可以到哪个部去当主事（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到地方可以当知府，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兼检察长兼法院院长。

有人或许会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在中央当处级干部，到地方当地市级干部，不对等吧？的确不对等。但是，当时就是这么个制度。而且我还要告诉诸位，谁被分到地方当知府，还满肚子不高兴呢？按照“大选”的惯例，二甲里选出若干人，排名最后的只能当知府，不能留首都。

张居正就不关心这些了。他直接到翰林院继续深造。深造完后，也不愁分配工作的事情了，因为制度上早就安排好了，庶吉士毕业后，基本上留在翰林院做编修或者检讨。

乍看起来，翰林院似乎不是什么好单位，要现在的人去选择，恐怕自愿去的不多，哪如到地市当个“一把手”过瘾啊！但是，明朝有一个政治惯例，具有宪法的功能，任何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也不敢公然违反的。就像现在英国的不成文宪法一样。

什么惯例呢？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就是说，只能是进士（年轻、名次靠前的）才可以进入翰林院，而只有翰

林院出身的人才可以进入内阁。换言之，没有进过翰林院的，将来是没有希望入阁拜相的。而且进入翰林院，是每次科举考试进士录取以后，再从进士里考选，大体上不超过二十人。已经参加工作，组织上觉得这个干部有培养前途，再去翰林院进修拿文凭行不行？不行！没有这样的制度，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谁这么干，就相当于违宪，想都不敢想！

那么，内阁是个什么机构呢？有人说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似乎不那么准确。这么说吧，如果有人想像为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我看是抓住了制度的精髓。

所以，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这一步很关键啊！

毫无疑问，庶吉士，那绝对算得上尖子中的尖子、精英中的精英了。而张居正获得这个机会，没有别的因素，只有一条：考试成绩。不过，庶吉士不是官，还算是“学生”，经过三个年头的继续深造，庶吉士毕业（当时叫散馆）后，张居正就留在翰林院做编修，而且一干就是十年。编修属于七品史官。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以“储相”看待。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后备干部，而且是宰相的后备人选！

到现在为止，应该说，张居正的起步，靠的首先是国家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这样相对公平的制度安排，估计张居正要爬上那么高的位置，是不太可能的。

再说张居正的聪明。

这个不难理解。靠老子，不行；花钱，不行；作弊，很难；那就只能由考试成绩说话！

官运亨通的奥秘 (3)

而要出成绩，勤奋固然重要，但是聪明还是关键因素。制度是公平的，考上考不上，只能靠自己了。全国上下，苦读书者大有人在啊！现在的高考被说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要和科举考试比起来，那才真是小巫见大巫呢！科举考试三年一度，进士录取在三百人左右。竞争何等激烈？！

张居正的老子，后来给张居正惹了不少麻烦的张文明张老爷子，就考了二十多年，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上，直到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做了官，还考了几次，才不得不放弃了。估计张老爷子没事的时候也会寻思：亲爹和儿子，血缘如此近，差别咋就那么大呢？

据德国一位很有名气的大学问家研究，说科举考试，主要考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不管怎么说，笨头笨脑的人恐怕很难挤过独木桥。

张居正是个聪明人，脑子很好使。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荆州知府搞了一个征文活动——意思就这个意思，当然当时不这么叫，作品还汇集出版了。其中就有张居正提交的一首小诗。这些征文后来被当时湖广省的“一把手”顾巡抚看到了，很欣赏，就对张居正格外关爱起来。以后张居正能够在北京取得一些人脉，起点应该与此人有关。

该说说张居正的人脉了。

本来，张居正出身卑微，是没有什么人脉可言的。

难道他花钱走了关系？错！不仅他没有花钱，人家当大官的，还给他钱花！

这个和当时的风气有关系。当时官场上读书人掌权，爱才是风尚，是美德，不管怎么说，哪怕是为了博取好名声，对有才华的后生都是看重的。

湖广省的最高长官顾巡抚，是当时有名的文坛领袖人物，曾经在中央做过大官，后来因为得罪了皇帝被贬到地方做官。这个人尤其爱才，发现了“荆州张秀才”，很器重他，不仅到张居正家里看望，给他

银子资助，还有意识栽培他。这个人和在北京主政的严嵩等人都非常熟悉，张居正只身到京，他很可能写信推荐（当时叫荐扬）过的。以顾巡抚对张居正的期许——说他将来必为国相，他不会不帮张居正沟通北京的关系。

有理由相信，张居正最重要的人脉，他官场上的导师、保护人——徐阶，可能就收到过湖广顾巡抚给他的荐扬信。徐阶的政敌严嵩一直对张居正也不错，可能与顾巡抚的荐扬多少也有些关系——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主要因素。

张居正因为有了国家给他提供的制度平台，有了他的聪明，有了这样的风气，结果他还没有进入官场，就获得了些人脉资源。

更重要的是，张居正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后，有一个人是教授庶吉士的，他成为了张居正名副其实的老师。那个时代，同乡、同学（当时称同年，即一同中举人或者进士）、师生，都是相当管用的关系，而师生关系，算得上是最铁的关系了。张居正就遇到了一位不凡的老师。当然，不是张居正一个人的老师。这个人就是徐阶。

说到张居正的人脉，徐阶是最为关键的人物了。

徐阶是当时在位的嘉靖皇帝所信任的高级领导干部，教授张居正这批庶吉士的时候，他是管文教的礼部侍郎（副部长），不久升转管干部的吏部侍郎，以后又做礼部尚书（部长）、内阁大臣，直到做了内阁首相（当时称首辅、元辅、首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执政者，当时也称为执政、当国）。

按照现在的地域划分，徐阶是上海人，这个人外表温和、敦厚，实际上很会算计，很有手腕儿。不过总体上说，徐阶在官场还算是一个正人君子。

徐阶像那个时候不少高官大僚一样，也很爱才。他的弟弟和张居正同时中了进士，可是这个人默默无闻，似乎没有受到过乃兄的关照。而张居正没有向徐阶送钱，也没有低三下四当他的“马仔儿”，甚

至还对徐阶产生过误解、指责，可是徐阶就是始终如一地栽培张居正、保护张居正、提携张居正。

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张居正每一次的升迁，都是徐阶精心设计的，前一个台阶为后一个台阶铺垫；四十岁出头的张居正，就被徐阶提拔到内阁，实现了入阁拜相的梦想。如果没有徐阶的栽培、提携、保护，有没有叱咤风云的张居正，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应该说，到此为止，张居正的升迁，靠的不是歪门邪道。问题是，制度平台、个人的聪明才智、乃至人脉，并不是张居正独自具备。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当国柄政，自有他的过人之处。这就不能不说，是张居正高超的权术，发挥了关键而又独特的作用。

这，才是真正的奥秘所在。而这个话题是贯穿全书的，这里就不好具体描述了。相信诸位看完全书，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

张居正中进士、点翰林，进而任低、中级官员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是被海瑞所痛骂过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这个人不能说昏庸，但是相当有个性，行为举止差不多可以算得上荒诞。他长期住在宫禁之外修身养性，不上朝，不主持会议，基本上不履行作为国家元首所应当履行的礼仪职责。但是，他对国政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牢牢控制着国家权力，只是方式跟别人有所不同，主要靠听取个别人汇报做决策。

办任何一件事、用任何一个人，要想办，都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的；不想办，也同样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汇报的人想办的，就按照想办的说理由；不想办的，就按照不想办的说理由。那很容易让听取汇报的人顺着汇报人的思路走。所以，法治国家要议会辩论，要自由公开的媒体争论，以免一面之词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就不展开讨论了。

总之，隐身幕后、高高在上的最高领导人，靠汇报决策，那么谁能够接近他、说得上话，谁就占据主动。所以，嘉靖朝的政坛，必然充满阴谋。

嘉靖皇帝选拔或者信任主要领导干部，还有一个特殊标准，就是会不会写“青词”。当时有一首诗说：“试观前后诸公辅，谁不由兹登政府。君王论相只青词，庙堂袞职谁更补！”可见，青词在最高领导人那里，简直就是提拔干部的硬杠杠了。

那么，青词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说，就是写在青藤纸上颂扬太上老君的华丽词藻，通过焚烧达于天听。沉溺于修道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需要有人给他提供这样的文字，谁写得好，他就喜欢谁，信任谁。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考验；是不是拥护他修道，对他的忠诚度如何，都可以通过青词来检验。

这种取舍肯定很荒诞啦！这是后来者的观感。就像我们说到某个时期天天跳“忠字舞”，觉得不可理解，而那个时候的人却很虔诚。写青词也如此。因为这样的缘故，嘉靖朝的政治，在充满阴谋的同时，还显得颇为诡异。

政治和权力密不可分。搞政治，不能没有权力。要得到权力，基本上可以说，除了明争，就是暗斗。明争也有不同的争法。比如，像现代不少国家的竞选，就是名副其实的明争。总体上说，我华夏传统政治中的明争，就是靠枪杆子！

这不是常态。而常态，就是暗斗。

其实，在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有些国家也已经有了公开选举的制度了。就是我们中国人中，也有人提出，该让有知识的人自由推举国家领导人。现在看来，主张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人，是有识之士啊！但是，在当时，这样的观点，是异端邪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处境好不了的！

好了，话题还回到张居正身上。

在张居正初入仕途，在翰林院工作的时候，内阁的首相夏言和“二把手”严嵩，因为青词写得好，都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担任礼部尚书（以下说到各部尚书，为了方便起见，就直接叫部长）的徐阶，也是青词高手，皇帝也很信任他。

张居正刚刚进入官场，就目睹了首相夏言和他的第一副手严嵩的争斗。

严嵩很有学问，有文才，为人很和蔼。他靠自己的毅力、忍耐，将近七十岁才有了出头之日。这个人开始很有操守，但是操守和名节换来的是在官场原地踏步。总结经验教训，他开始投机钻营，而同乡夏言是他巴结的对象。在夏言的提携下，加上严嵩的青词写得很好，深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所以渐渐地爬上了内阁“二把手”的位置。在表面恭恭敬敬的同时，暗地里，严嵩却不断施展各种阴谋，取得了最

高领导人的信任，终于把夏言赶下了台。德高望重的夏言，不仅被罢官，而且被斩首，下场实在可怜！

严嵩这个人，学问应该说不错，也特别勤政，但是安邦治国的能力有些欠缺。他最大的本事是对最高领导人很柔顺，基本上属于在领导面前当哈巴狗类型的干部。因为柔顺、和蔼的严嵩和比较刚强的嘉靖皇帝在性格上具有互补性，可谓珠联璧合，相互利用着，所以他执政的时间相当长。

但是，在儒家的意识形态里，是反对臣子对上司一味柔顺的。尤其是领导如果有毛病，他们认为就应该直言不讳提出来，不能逢迎，即所谓“逢君之恶罪大”。所以，在正人君子看来，严嵩的表现就是小人、奸佞。故其独掌朝纲的基础并不稳固。而此时作为低级干部的张居正，在目睹了夏言的悲惨下场后，又经历了一场更为持久激烈、更为复杂微妙的上层权力之争。

这就是严嵩当国后的次辅徐阶与首相严嵩之间长达十余年的较量。

徐阶经历坎坷，正统有为，声名显赫，正直之士和舆论无不寄希望于他。徐阶最终没有辜负期许，他以慢功撼大树、扮猪吃老虎之法，经过长期较量，斗智角力，用尽权谋，渐掌主动，最后扳倒了严嵩父子。

倒严之役是一场惊心动魄、充满巨大风险的权力斗争，也是一出充满曲折离奇故事的官场活剧。

在扳倒严嵩以后，中央的主要高官，以徐阶为首？包括他的对手高拱等人，当时应该说都算得上是有为有守的正人君子，绝无奸佞之徒，也都有拨乱反正的决心和举措，而且内阁诸人，又多为徐阶引荐、拔擢而升任；但内阁交叉连环式的权力斗争，却并未止息。

这是人治社会官场高层争斗的常态，复杂、微妙，曲折离奇，充满智慧、手腕，也不乏阴谋、诡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从张居正入阁到他独掌大权，短短六年时间，先后进入内阁的共有九人，即所谓的九相。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而又复杂的交叉连环式的权力争夺战，其中的八个人都先后被淘汰出局，张居正成为唯一的赢家！足见张居正其人权术之高超、手段之高明！

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 (1)

官场暗斗，很耗人。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可是，既然进入官场，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宦海波涛，思量自己的应对之策、处世之道。张居正当然不能例外。他，也曾经想躲避，可是，只要还想在官场混下去，是无处躲藏的。他只能面对。

不少人，面对官场的是是非非，是何种态度，何种表现，一看就能够看出来。而张居正不同，他是一个深有城府的人，一般人是琢磨不透他的。

根据张居正的同年、历史学家王世贞的记载，“居正为人，……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不仅王世贞这样说，正史中涉及到张居正的，大体上都少不了这样的说法。对于城府很深的人，估计大家对他的印象好不到哪里去，朋友不会太多。当然，同僚中，张居正能够看得上眼的，也不多。

不过，应该说，张居正初入官场时，算得上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才俊。

这个也不难理解。那个时候的读书人，从开蒙到中进士，一直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接触社会现实不多，而所读的书，都是孔孟程朱这些圣人的著作，所谓名教贤训，都是理想主义的说教。如果说一直受到这样的熏陶，成为书呆子有些可信度，熏陶出一个坏人来，那是没有说服力的。

就在庶吉士毕业的那一年，二十四岁的张居正就给当时的嘉靖皇帝上了一个建议书，名为《论时政疏》，批评了最高领导人不勤政，各级干部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分析了国家存在的问题，呼吁大家都振作起来！这个建议书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估计谁也没有把他当回事，至多会认为是一个小年轻儿想出风头而已！

这个时候，张居正意识到，名教和现实之间，不啻天壤之别。现实的官场与读书人一直研读的圣经贤传、名臣嘉言懿行对照起来，甚

至是南辕北辙！

“我的妈呀！”估计张居正观察到官场的真实情况，免不了会这样感慨，“人人都想做官，哪里知道官场如此复杂啊！”

的确，官场根本不是像当局所宣称的那样，什么勤政爱民之所，什么表率民众之地！冠冕堂皇的文告与卑鄙齷齪共存，爱国忧时的高尚情操与阴谋倾陷并列，黑白混淆，是非不时易位，堂堂中央政府，其实是施展阴谋诡计、明暗手段以相互撕咬的战场！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刚刚跨入官场的时候，张居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保持人格还是同流合污的矛盾中。

最终如何抉择呢？

张居正的同年杨继盛等不少人，要么上疏诤谏皇帝，要么就公开弹劾首相严嵩。而张居正，选择了沉默以自保的方式，给人留下了城府深不可测的印象。

实际上，面对上层复杂的权力争斗，张居正并不是一味沉默自保。这个也还只是表面现象。在一般人看来，张居正不言不语，从不乱说话，瞎议论，而且对谁都不亲不近、不即不离，似乎很超脱。可能谁也不知道，暗地里，张居正却巧妙周旋，两面讨好，上了双保险。

严嵩和徐阶的争斗是很漫长、很隐蔽的。这个时候正是张居正初入官场、沉于下僚的十年。他是徐阶的学生，内心也很亲近徐阶；但是他也知道严嵩在中央的势力和分量，徐阶能不能斗过他，最终鹿死谁手，他也是没有什么把握的。

张居正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绝对不能给人一个紧跟徐阶不动摇、是他的马仔儿的印象。仅此还不够，他对徐阶的对头严嵩，也极力讨好。

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 (2)

顺便声明，我写出这样的事实，不代表是在谴责或者揭露张居正。以我的看法，张居正这样的策略，和杨继盛他们比，当然有些不太光彩，也为正直之士所不齿。但是，在那么复杂的官场，一个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又怀抱远大理想，他要避祸，更希望获得升迁的机会，找到施展抱负的平台，这么做我觉得也无可厚非，还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吧？

问题是，张居正怎么才能和严嵩套上近乎呢？

徐阶是张居正的老师，师生关系在那个时候是最厉害的门路了。张居正取得徐阶的信任并不难；可是，严嵩就不同了，他位高权重，马仔儿甚多，想投靠的人估计也排着长队。张居正不过是小小的七品官，差不多算得上默默无闻，他要想讨好严嵩，得到他的信任，不太容易吧？

固然，严嵩是比较贪的一个人，花钱买路子或许是个办法。可是，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工作在清水衙门，工资不高，绝对不是大款，想送也送不了多少钱；他也不是什么名流，估计也没有名贵的字画和古玩能够拿得出手。

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于是，张居正悄悄地替严嵩捉刀代笔，写了大量善颂善祷的文字，令皇帝老儿龙颜大悦，直说年近八旬的严嵩文采不减当年，退休的事不要考虑了，继续干下去没有问题。

张居正还精心撰写了不少吹捧严嵩父子的诗词歌赋，很是肉麻。结果，就连在官场摸爬滚打、游刃有余、老奸巨猾的严嵩也被他蒙蔽了，直夸奖他不亢不卑，光明磊落、才堪大用。所以，当徐阶提出张居正该提拔了的时候，严嵩很痛快就答应了。

这是很不容易的。往往，暗中较劲儿的双方，对对方提议任用的干部，是很敏感的，闹不好会适得其反。但是徐阶和严嵩对张居正都

很器重、很喜欢，所以，对张居正的提拔，就是例外了。

在徐阶和严嵩的争斗近乎白热化的阶段，张居正第一次升迁了。虽然只是个虚衔，但作为一个台阶，却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老于世故的严嵩哪里想到，“光明磊落”的张居正，暗地里一直为徐阶推倒严嵩父子出谋划策呢！实际上，因为高层的争斗，很多人都牵涉其间，有的甚至丢了性命。而张居正，采取了表面上韬光养晦、暗地里两面讨好的策略。这样就保证了无论最终的结局如何，张居正都不会吃亏。

终于，严嵩败在了徐阶的手下。严嵩的倒台和随后不久嘉靖皇帝的去世，预示着一个以高压手段维持的是非颠倒的时代 ends。

果然，一俟徐阶当国执政，就对张居正尽力提拔。

力度大到什么程度？说起来简直让人觉得不太可信。从一个中层干部，一年时间内就提拔到内阁大臣的位置；级别连升七级！我看，倘若诸位产生这样联想，是未可厚非的：就张居正当时受到提拔的程度看，相当于现在一个司局长一年时间内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而且，徐阶对张居正的每次提拔，都不走正常的干部提拔任用程序，而是以特殊方式运作成功的！也就是说，从徐阶掌握大权、说话绝对算数以后，张居正的官运就来了，他属于坐直升机升上去的干部！

要一般人看，对自己的保护人、官场的导师徐阶，张居正绝对应该死心塌地、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了！

所以说是一般人嘛！可张居正绝对不是一般人啊！

那，张居正怎么样对待徐阶的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1）

现在，四十二岁的张居正，坐直升机升到了国家最高决策层，当上了最后一名内阁大臣，即所谓的“末相”。高兴之余，张居正很快就发现，他面临着一个大麻烦！

应该说，这个考验是严峻的。怎么回事呢？这得稍微展开点说说了。

必须承认，官场也是人组成的。而人，是有感情的。就说张居正，他能够那么顺利升到如此之高的位置，就多亏了徐阶。说他对徐阶没有感激之情，是不客观的。张居正后来就一再表示说，受到“老师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于丘山”。就是说，张居正自己也承认，徐阶对他，恩重如山。

但是，官场中的感情，实在太脆弱了。在有的人看来，与权力比起来，重如泰山的恩情，其实比纸还薄啊！是不是这样，请诸位看看张居正的表现就知道了。

我还要说一句，没有官场经历的人或许根本想像不到，官场中的人、尤其是高级领导人，不像人们看到或者相像的那样风光。甚至，就连升职，也会带来烦恼。因为，升到哪个位置，就会有哪个位置带来的问题。

到了张居正得以入阁拜相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难题。

这不，当张居正一坐到内阁的办公室，就感觉到了这个国家中枢机构里，充满了火药味：首相徐阶和次辅高拱，内阁里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也是当时中央威信最高、被认为是第一流政治家的两个人，正在展开激烈地争斗。

而这两个人，和张居正的关系，都非同一般。徐阶就不用说了，他是张居正的保护人、官场的导师。可以说，徐阶对张居正恩重如山。现在，他张居正能够坐在这里，全是因为徐阶的一手提拔。

另一方的高拱，则是张居正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说法，他和高拱是“生死之交”；按照高拱的说法，他和张居正是“金石之交”；按照当时一些知情人的说法，高拱和张居正的关系，属于“刎颈交”，其亲密程度，“胶漆金石，不足比拟”。还说他们“同道同心”“肝胆相照”。关系怎么样，好到什么程度，恐怕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词加以描述了吧？如果说他们两个人情同手足，似乎也不算夸张。

诸位想想看，一个恩重如山，一个情同手足，这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斗，让张居正如何是好呢？似乎有点像婆媳不和，做儿子和丈夫的，夹在中间实在不好办。

其实，问题还不止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

引发徐阶和高拱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索，和张居正有关；而徐阶之所以派直升机把张居正接到内阁，又和他想解决与高拱的矛盾有关。

事情是这样的：简而言之，徐阶作为首相，和内阁里能力最强的高拱，政见不同，性格和处事方式差别很大，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这个要说也正常，也还能够彼此迁就勉强维系下去。但是有一件事，高拱耿耿于怀，导致他和徐阶的矛盾公开化了。

这件事，简单说就是因为一份重要文件的起草。这份文件具有路线、方针、政策的性质。其重要性，可以约等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

按照制度或者说惯例，这样重要的文件，应该是通过内阁研究讨论的。可是，徐阶瞒着内阁所有的同僚，偷偷干了！等到文件公开发表了，包括高拱在内的内阁同僚们才知道。

实际上，这份文件的执笔人，就是张居正。当时他的级别还相当于司局级干部。徐阶偷偷把张居正找去，两个人冒着风险，深夜秉烛，字斟句酌，完成了文件的起草。正是因为徐阶瞒着同僚起草了这份文件，才导致高拱的激烈反应，两个人的矛盾于是公开化了。所以，我说徐阶和高拱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索，和张居正有关。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2）

当然，张居正参与起草这份重要文件的事，是绝密，只有徐阶和张居正两个人知道。也正因为如此，当高拱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不依不饶的时候，作为应对措施的一环，徐阶以他的威权，给张居正提供了直升机，让他赶紧进入内阁。

或许，诸位早就有人有这样的疑问了：徐阶为什么那么卖力提拔张居正呢？答案就在这里。

当然，不能说这是全部。以我的分析，徐阶之所以如此打破常规提拔张居正，原因有三：第一，张居正是他的学生，自己人。人治官场，用干部首先用自己人，那是铁律。第二，张居正在暗地里是他徐阶打倒政治对手的幕僚，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作为酬劳，也应该提拔。第三，张居正这个人，有能力有抱负，而且深有城府，善于韬光养晦，权谋过人，完全可以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和高拱矛盾的公开化，加快了徐阶提拔张居正的步伐，已经到了不管不顾、提拔上来再说的程度了。很显然，徐阶是希望张居正能够帮助他对付高拱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面对这个局面，张居正该怎么办？

我要告诉诸位，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说明我辈真是书呆子，实在太平庸了！至少，是一般人的一般想法在作怪。而张居正，不是一般人啊！

根据著名专家韦庆远先生的考证，在波谲云诡、微妙多变的斗争中，张居正“极精明地选择好对自己收益最大、风险最小的策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再加上风险最小化。

按照这个策略来权衡，那么，张居正面对徐阶和高拱之间的争斗，就不觉得是麻烦，恰恰相反，很可能，在张居正看来，这不是坏事，是大好事。

因为，很显然，两强相争，必然两败俱伤，说白了，最好是徐阶和高拱连同他们各自的同党，都卷铺盖回家！如此，则毋须劳张居正费神，横在前面的两个强势人物就一下子都搞定了。这对张居正没有损害，只会带来利益！

话虽这样说，毕竟，张居正和两个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如果言行中稍微流露出如此的想法，那后果是严重的。这就需要政治智慧了。

那么，表面上，张居正是怎么处理如此复杂的关系的呢？

公开的记载是这样的：张居正并不像徐阶所期盼的那样，站在徐阶一方，哪怕是稍有表示！即使是高拱公开拿那份实际上是由张居正执笔的重要文件做文章和徐阶较劲儿，在公开场合，张居正只是保持沉默，不发一言，更不要说站出来为徐阶辩护了。当然，张居正也不会公开替高拱说话，尽管他内心觉得真理在高拱这边。

不用说，张居正也会做些表面文章，比如在徐阶和高拱面前，说些无关痛痒的劝解的话。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张居正很为难，很尽力地在调解徐阶和高拱的矛盾。

暗地里，张居正是不是有故意挑拨离间、火上浇油？——当时的一些人是这样看的，不过，张居正是不是真的这样做了，我不好断言。但从张居正以后的表现看，这个结论多半是能够成立的。

那就先存疑吧。

但是，有一点无可置疑：张居正，该出手时就出手。

他出手的第一个对象是高拱。

毕竟，徐阶在官场，身经百战，绝对是老手，高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尽管总体上说，理在高拱，但是他还是抵挡不住徐阶的手腕儿，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在徐阶的策划下，中央各部门的干部，纷纷出面攻击高拱，强烈要求他下台！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 (3)

这个时候，张居正出面了。

张居正出面，当然不是替高拱说话，他是要高拱赶快卷铺盖回家！

从史料上看，张居正似乎对高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现在老兄的处境很危险啊，还是暂避锋芒为好；等到时机成熟再回来也不迟啊！他可能还说过，等时机成熟了，小弟我替老兄在皇上面前转圜，请老兄再回来！

我甚至怀疑，张居正可能还向高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会想办法，请走徐阶这尊神，我兄不会等得太久！

高拱听从了张居正的建议，辞职回家了。

也许，张居正转脸会对徐阶说：“师相，姓高的被学生打发走了！师相这下终于可以安心了！”

这是我的猜测。但是我估计十有###是真的。为什么这么说，请诸位先不要着急，往下看。

当高拱下台回家的时候，内阁里的六个人，就剩下五个了。其中一个叫郭朴的，相当于“三把手”的位置，即排在徐阶、高拱之后。他是内阁里唯一一个公开站在高拱一边的高级干部。对他，张居正就不客气了，毫不犹豫地“佐徐逐之”！这样，内阁里就剩下徐阶、李春芳、陈以勤和张居正四个人了。

徐阶就不用说了。李春芳是张居正的同年，是那一科的状元。这个人是个老好人，能力差、人品正，对徐阶执弟子礼。陈以勤是张居正科举的老师，是前辈，但是他是与世无争的“自了汉”，这个人似乎对一切都无所谓，在内阁里基本上属于可有可无的角色。

要说，这个班子是应该很和谐、很团结的。作为首相的徐阶已经没有了任何对手。他应该是心情舒畅、志得意满了。

但是，这又只能是一般人的想法。

张居正不是一般人。现在的徐阶，在张居正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是他张居正恩重如山的导师和保护人，而是他夺取更大权力、施展宏伟抱负的障碍了。

所以，徐阶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

当然，并不是说，张居正此时会和徐阶公开作对，公然采取措施驱逐徐阶。真要这样，那就不是张居正了！

以我的分析，导致徐阶很痛苦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他和高拱的争斗余波未了。虽然徐、高之争以后者的下台告一段落，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实际上，徐阶也不得不认识到这样的现实：他和高拱的争斗，自己并未取得完全的胜利，而是两败俱伤。因为随着高拱的下台，中央和地方干部中内心同情高拱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他们对徐阶的不满在逐步发酵、发泄出来。徐阶的日子，就显得不那么好过了。第二个原因是，徐阶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隆庆皇帝，互不欣赏，彼此对对方都产生了深深的失望情绪。

这其中，张居正是不是在背后做了文章，比如鼓动亲高拱的干部攻击徐阶等等，我不敢断定。反正事实是，当时不少人都开始上参折对徐阶展开攻击。

但是有一点可以绝对肯定：张居正希望徐阶早点下台！

因为，只要徐阶下台，内阁，这个国家的中枢机构里，就剩下李春芳、陈以勤和张居正三个人了。而李春芳和陈以勤这两个人，虽然都比张居正资格老、牌子硬——他们一个是张居正的老师，一个是堂堂的状元出身，但是，从主观上说，这两个人都是与世无争的老好人，他们都没有野心，也没有权力欲；从客观上看，这两个人能力都不怎么样，威信也一般。就是说，这两个人没有当国执政、驾驭全局的欲望，也不具有这个能力。那么，实权就落在了张居正的手里。以这两个人性格和能力，张居正略施小计，就可以把他们赶走，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执政当国者，就是他张居正无疑了。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4）

还有一个理由。张居正这个时候急于表现自己的才干，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他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徐阶似乎不那么合拍，而他又不想公开和徐阶对立，落下背师犯上的恶名。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暗地里活动，尽快把徐阶打发回老家！

时机也比较成熟了。两败俱伤嘛，现在高拱已经败下阵去了，伤痕累累的徐阶也别硬撑着啦！所以，张居正又出手了！

不过，这次张居正不是公开、直接地劝徐阶下台，而是采取了釜底抽薪、断绝后路的办法。

这样的机会大大的有。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有惯例，一般说，受到参劾的人，或者说和谁闹了矛盾，以及自己认为不再被领导信任（比如提出的什么建议没有被采纳）的人，就会主动请求辞职。而同样是惯例，他也会受到慰留。也就是说，一般说来这只是无伤大雅的程序。

这些走程序的事，实在太多了，大家都习惯了，不觉得会有什么意外的。比如前一年和高拱斗的时候，徐阶就曾经一连上了四道辞呈！

张居正看准了这样的机会，他要徐阶再次走程序，而暗地里，却把程序变成了现实！

据张居正的同年、历史学家王世贞和后来几位有名的史学家的记载，徐阶在受到不断的攻击以后，提出了辞职，这个时候，张居正在幕后和皇帝身边的太监打招呼，说不要挽留徐阶，赶紧准了！

顺便说说，在当今皇帝还是裕王的时候，张居正曾经给他做过老师，而王府里的“中官”即太监，张居正结交了几个。其中有一个叫李芳的，现在在皇帝身边管事，张居正就找到了他。

徐阶接到文件，自然是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于是，在高拱下台一年后，徐阶也灰溜溜地卷铺盖回苏州（华亭当时归苏州管）老家了！

就这样，两位难得的政治家、第一流的人才——高拱和徐阶，相继下台了。

按理说，在徐阶和高拱的争斗中，张居正没有站在自己的一边，明显是辜负了徐阶对他的期许，徐阶应该对张居正产生怨怒才对啊！而高拱呢，既然张居正和自己是生死之交，那么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张居正居然袖手旁观，不帮助他渡过难关，还算是朋友吗？他也应该对张居正产生疑问才对啊！

事实却正相反！无论是高拱还是徐阶，对张居正都没有恶感，相反，都把自己以后的命运，或多或少寄托在他的身上！

高拱似乎认定，他和张居正这个“金石之交”已经有了约定，将来找机会，张居正会替他活动，让他复职再起的！

徐阶就更进一步了。可以说，久经宦海沉浮的徐阶，对官场的波谲云诡是了然于心的，但他甚至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了张居正身上。很可能，在临别前，徐阶拉住张居正——这个自己精心培养的接班人的手，言辞恳切，老泪纵横！将国事、家事，都托付给了张居正！

其实这也不是秘密。张居正自己就说，我张某人“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之事托之于不肖（自谦，即我的意思），天下莫不闻”。

看看，两个政治强人的争斗，两败俱伤，可是都不怪张居正不帮忙，反而对他更加信任，把各自的命运都托付给他啦！

那么，在徐阶和高拱的争斗中，张居正到底是不是像现在我们所说的，只是从中调解，并未参与其间，这结论就很值得怀疑了。很可能，在徐阶面前，张居正为帮他整垮高拱出些主意；在高拱面前，张居正又为他和徐阶相争献点计策。

至少，张居正应该是故意给两位政坛强人造成了这样的错觉：徐阶认为张居正是站在自己一边整高拱的；高拱认为张居正是站在自己一边对付徐阶的！所以，两个人不仅对张居正没有意见，还挺感激他的！对他越发信任了呢！

想想看，一般人遇到这样复杂的情况，处理起来，谁能达到张居正这样的境界？！

可见，所谓的恩情、友情，哪怕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在张居正的眼里，都算不得什么。他内心，是根本不会受到这些什么情啊、恩啊的约束的。

最高明的还在于，张居正如此一番施展，效果圆满达到不说，还没有被任何人看破，他的形象不仅没有受到损害，还更加光辉起来了。灰溜溜下台的人，还不约而同，争相对张居正表示感激呢！张居正这个人，权谋是不是分外高超？！

但是，我得补充说一句，仅仅因为张居正施展权谋、推波助澜促使自己的恩师徐阶下台，就说张居正多么阴险，似乎不太厚道，未免多少有些苛求于前人了。如果张居正认为有徐阶在，不利于他施展抱负，推行新政，那他玩点权术把恩师打发走，或许也是可以谅解的。

顺便再说一句，徐阶下台后，张居正和徐阶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就是说，张居正俨然成了徐阶的保护人，而围绕张居正和徐阶的关系，还发生了不少事，直接影响到了以后最高层的人际关系乃至政局。此是后话。

得来还需费功夫 (1)

可能连张居正也未必预料得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

张居正坐直升机进入国家中枢机构不久，挡在他面前的强势人物，竟然就纷纷下野了。

而现在，内阁里，三个人中，李春芳、陈以勤，两个人都是能力平平、与世无争的老好人。坐在首相位置上的李春芳，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用一个现代的名词——“左派幼稚病”患者。

我的意思是说，李春芳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很左，左到幼稚可笑的地步。他曾经说过，国家的事千头万绪，治国的方略或许有别，但是，在他看来，要抓关键，牵牛鼻子。那么，关键是什么呢？李春芳认为，关键是学好理论，用理论武装头脑。只要大家都集中精力学好、领会好名教圣训，“旋乾转坤，易如反掌”！

张居正自然是不会把这样的“病人”放在眼里的。年方四十三岁、脱离司局级干部的级别才不到两年、入阁拜相也才刚刚一年的张居正，有了天将降大任于己身的感觉。

事实也是这样的。据张居正的同年王世贞的记载，张居正虽然位列最后，但是部长们都怕他，即所谓“畏惮之，重于他相矣”。另据当代的明史研究专家韦先生的说法，在三人内阁里，“张居正实际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张居正似乎不太满足。他需要的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说白了，他要当内阁的“一把手”！他要当国执政，大权独揽！甚至，按照张居正的理想，他要独裁！

怎么办？是不是把李春芳和陈以勤赶走？张居正似乎能够做到。但是，他不会这样做。

稍微琢磨一下就会想到：赶走两个人，内阁首相的位置会不会给他张居正坐，还不能肯定。最高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们对他统筹全局的能力的了解也不够。毕竟，他资历尚浅，而且一向韬光养晦，城府很

深，别人对他当国执政、治国安邦的水平和能力不够了解也是很正常的。

更重要的还在于，如果真是张居正亲自出手直接和内阁的同僚发生权力争斗，那手腕儿未免太一般了，太落俗套了！那也就不是他张居正了。

但是，又不能等。于是，张居正出手了。

在徐阶下台后仅仅一个月，张居正就急不可耐地站在统筹全局的高度，“发表”了“施政纲领”。

顺便说说，正是由于张居正表现得如此急不可耐，恰恰说明他是迫切希望徐阶下台的。如果徐阶还在台上，他是不会发表“施政纲领”的。而徐阶一下台，他就当仁不让、迫不及待地统筹全局了。

当然，不用“急不可耐、迫不及待”这些词也是可以的，用只争朝夕，也未尝不可，总之，张居正确实是等不及了。

隆庆新朝除了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停止了嘉靖皇帝因修道而搞的一些怪诞做法外，根本没有新气象！可是，排在张居正前面的两位大佬，一味折节礼士，你好我好大家好，连振作起来的想法也没有！张居正是看不下去了！所以，他一改过去的韬光养晦之策，闪亮登场了！

当然，说张居正发表施政纲领，那是我们现在的说法。当时没有这个名词。他的原名是《陈六事疏》，是上报给隆庆皇帝的。就其性质和作用言，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施政纲领。

张居正在“施政纲领”里说些什么？他所说的六事就是：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总而言之，张居正的意思是，要统一思想，令行禁止！要整顿吏治、整顿财政，加强国防！

得来还需费功夫（2）

这六件事，确实是张居正的施政纲领，以后他当国，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做的。按照写过《张居正大传》的朱东润先生的话说，这个施政纲领，不啻是独裁者的宣言书！

那么，张居正要谁来独裁呢？当然是他自己了。可是，张居正总不能公开讲要由他自己来独裁吧？所以，他只能呼吁皇帝独裁。

但是，谁都知道，当今皇帝是个对治国理政根本就不感兴趣的人，从来就放手让内阁来干，他是断断不可能去独裁的！实际上，他既没有这个愿望，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一点，张居正心知肚明。

那就应该是内阁独裁了？

可是，内阁里的“一、二把手”，是那块料吗？连他们自己也不敢说是那块料！两位大佬，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要独裁！说这两位老兄避之唯恐不及还要更恰当些！对此，张居正再清楚不过了！

数来数去，也就非他张居正莫属了！不错，这正是张居正的本意。

张居正是用这个办法，展示自己，告诉最高领导人和各级干部们，应该让我张居正来统筹全局，领导国家，实行新政！说得再直白些，张居正是说，请让我当国执政！

得出这个结论，不是我的发明。

和张居正几乎同时代的一个官员（曾经担任国子监的“一把手”）邓先生在他所写的《国朝典故》一书里就明明白白地这样说，他读了张居正的施政纲领，读出了这样的信号：“不言自用，而自用之机已露”！现在的专家也有人这样看。韦先生就说，邓先生的结论，“切合”张居正发表施政纲领的“本意”。因为张居正“当时虽然已入阁为大学士，但绝未满足于此，他热切希望能够再上层楼，秉国之钧，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谋划，重整乾坤”。

那要这样说，张居正还是比较光明磊落的。尽管张居正这样做，近乎伸手要官，但是人家是公开的，拿出自己的东西了，领导和“群众”，你们看着办吧！

事情当然不这么简单。这个施政纲领里面，实际上也“间有用术”。

说白了，张居正也认识到，领导给不给他想要的官，不能简单就是要，得揣摩一下领导想要什么，先满足领导的要求，领导才会满足自己的要求！

所以，张居正在“饬武备”这一部分，作为饬武备的一项具体措施，建议请国家元首举行“大阅”。

所谓“大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大阅兵或者叫阅兵大典。

果然，据专家韦先生的考证，在张居正的整个施政纲领里，最高领导人“最高兴接受并立即饬令实行的”，就是大阅这一点。

要知道，有明一代，圣驾大阅的，唯有根据张居正的提议搞的这一次。就连最喜欢戎服远征、自封为大将军的正德皇帝也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据说，仅此次阅兵大典，花费就达二百万！无论是当时的广大干部还是后世的史学家，一致认为此事纯粹属于劳民伤财之举。而张居正的提议，绝对是馊主意！

张居正难道不知道，搞这样的事是劳民伤财吗？他真的觉得是“饬武备”所必需吗？应该不是的。那他为什么还要提出来搞呢？——当然是要博取领导的欢心啦！

有人就因为这件事嘲讽说：“此公善于逢君如此！”说白了，就是批评张居正讨好领导有些过分了。

说这话的，是一个叫沈德符的人。这个人和张居正是同时代的人，在张居正主政之初进士及第。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出身，曾任职监司词林。沈先生自幼生长于北京，曾在国子监读书。由于家庭的原因，他得以同当时的许多台上台下的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有较多

的交往，熟悉中央的事务及许多内幕。之所以顺便介绍这么多沈先生的情况，是因为以后还会经常用到他给我们提供的证据或者作出的分析。

专家韦先生也说，张居正所提的大阅兵之议，“无疑是一个败笔”。

但是为了自己想得到的，昧心出个馊主意，博取领导欢心，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毕竟，一个人能不能升官，不是老百姓的选票，而是领导的想法来决定的啊！

不过，张居正的做法，似乎有点得不偿失。为什么这么说呢？

结果在这摆着呢！张居正并没有达到目的。国家元首似乎没有提拔他当首相的意思。

这已经使张居正很失望了。不仅如此，张居正还意识到，他发表施政纲领之日，就是引起不少高级干部嫉妒乃至嫉恨之时。所以张居正感慨道：“忌我者亦自此始矣！”用句俗语，就是没有抓到狐狸，还惹了一身骚！这件事，对张居正可能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

说不大，是因为结果仅仅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已；说不小，是因为张居正的仕途官运实在太顺遂了，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挫折”。以往，他想要的，都能够得到；他要出手，必定成功。而这次，预期目的却没有达到。

很可能，张居正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官场上，伸手要是要不来的！要权力，就要准备投入激烈的战斗！

官场上，权力也好，职位也罢，得来还需费功夫啊！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1）

和张居正的预想不太一致，情况在不断变化中，张居正很快就意识到：徐阶走了，自己的麻烦来了。

原以为，没有了徐阶和高拱，他张居正的机会就来了。于是，他迫不及待发表了施政纲领，并施展了权谋，讨好最高领导人，想着能够尽快更上一层楼，秉国之钧，施展宏伟抱负！

可是，左等右等，在张居正发表施政纲领一周年之际，等来的却是老干部赵贞吉入阁的消息！

徐阶下台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尽管张居正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位置，但是，也应该说，在中央，差不多是他张居正说了算的。

然而，随着赵贞吉被提拔到内阁，张居正想退而求其次也成了奢望。

可能是对内阁的执政能力，最高领导人还不太放心；或者说，最高领导人觉得政府中枢的几位大佬的分量尚嫌不足，在徐阶下台一年后，一位有威望、有能力的老干部赵贞吉，被补充进来了。

这是位资历非同寻常、相当强势的人物。

赵贞吉算得上名副其实的老干部了。他科举中进士的时候，张居正还不到十岁呢！屈指算来，这位赵兄，在官场已经沉浮三十余年了！

据正史的记载，老干部赵贞吉，为人“具才略胆识，有伉直声”。或许正因为如此吧，这位老兄在官场上的经历，三起三落，很是坎坷。

早在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张居正庶吉士刚刚散馆不久，已经担任国子监“二把手”的赵贞吉，因为得罪了当国的严嵩，被喜怒无常的嘉靖皇帝下令逮捕，后来贬到大西南的一个叫荔波的地方，在县政府给县领导帮忙打杂。可是，这位老兄似乎没有因此而消沉，依然干劲十足。经过十余年，又慢慢提拔上来，升到了最重要的部——户部副

部长的位置。不过，磨难似乎并没有使他磨掉棱角，以至于在副部长位置上干不多久，又公开顶撞严嵩，受到撤职处分，被打发回老家去了！

“十年两逐”的赵贞吉，一点也没有改变自己，除了年龄！“青衫去国，白头回朝。”垂垂老矣的赵贞吉，感激隆庆皇帝给了他发挥才干的机会，准备大干一场了！

问题是，赵贞吉这位老兄，性格很是“豪直自用”，还常常意气用事，而且不能容人。

这样一来，赵贞吉和张居正难免会发生冲突了。想想看，连自己的恩师，张居正都想赶走，何况一个性格伉直不能容人、与自己素无渊源的老干部呢？

还有一点应该说明，赵贞吉不但是内阁大僚，还兼任都察院的“一把手”！

这个兼职了不得的！

因为以后会经常出现这方面的人物，不妨对此适当展开说说。

都察院是个什么机构？

现在，一般理解为相当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部。这个说法很流行。这么理解似乎也没有错，但是很不全面，甚至可能会造成误解。而依我看，都察院，就其职能、权责、运作方式上看，近似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国会！除了非选举产生这一点以外！

都察院的主体由御史组成。御史，就是我们所说的言官。

言官，有言责而不负实际行政责任，有些现代国家国会议员的味道。比如言官对国政实施全面的监督，对执政者的政策措施、高级干部的言谈举止，都要加以监督；可以对政府首脑和大大小小的干部公开弹劾（对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部长们的弹劾经常发生），而且是风闻而奏，就是说，弹劾的对或错都不承担责任（即相当于现代国家议员的言论免责权）；他们也应该对最高领导人（皇帝或者代替皇帝行使权力的人）的言行提出规劝、抗议（经常发生），正常情况下，对任

命高级干部也非常有发言权，直接参与投票。他们还有现代国家媒体的某些功能，当时所谓舆论，主要就是他们这些言官的主流看法。可以说，言官的权力和影响力是很大的。值得肯定的是，当时还规定了权力和责任的对等。就是说，国家出了大大小小的问题，他们没有发现或者不提出纠弹，要被问责（经常发生）。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 (2)

这是按照儒家的思想设计的一套制约体制，目的是防止任何人包括最高领导人的独裁专断。

从地位、职能上看，我认为言官更接现代国家的“议员”。实际上我国最早翻译议员这个词，用的是“议郎”，而言官，在历史上，就曾经叫作议郎。

事实上，孙中山在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后，对监察官即言官很重视，认为值得借鉴，他把西方的三权分立改造为五权分立，其中的监察权就是从国会中的立法权分离出来的；监察院也具有国会的性质，而监察委员和立法委员都可以称为国会议员。

所以，把言官或者说监察官，称为“议员”更贴近些，至少比把他们比作现在的纪律检查、监察干部，要贴近得多！

正因如此，我说，都察院更具有现代民主国家国会的性质，而言官，就具有议员的性质。

顺便再说一句，言官虽然多是七品，但是口含天宪，在首都监督中央高级干部，到地方就是代表中央。一个七品言官，摇身一变就可能成为省里的“一把手”。所以，每当进士“大选”，第一选择，就是当言官，而不愿意去地方当相当于市委书记兼市长兼法院院长的知府！

赵贞吉兼任都察院的“一把手”，相当于“議長”了。也就是说，话语权基本上就掌握在这位老干部手里了。

既然赵贞吉要“舍身任事”，那么，一年来，内阁里基本上是张居正说了算的局面就难以维系了。

果然，决定军国大事，张居正的发言权无形中被剥夺了。有一次，内阁研究军事将领的调动，张居正认为非常不合适，绝对不应该那么做。可是，他说了不算，只能写信给朋友做些解释、发发牢骚而已，并顺便说清楚，如此愚蠢的决定，是不会出自他张居正的。

权力大大缩水还不算，赵贞吉这个老干部，根本就看不起张居正！

内阁研究工作，张居正一发言，如果不符合赵贞吉的胃口，他动不动就会说：“切！这哪里是你这个年轻人所能晓得的！？”

平时同僚间适当进行交流，谈论学问上、意识形态上的事，赵老兄更是不客气，很轻蔑地说：“切，浅学！夸夸其谈谁都会，可是，你懂什么呢？！我看你也就是懂点韩非子那点邪说罢了！”

对一个自视甚高、自认为满腹经纶的堂堂高级领导干部来说，老干部赵贞吉的话和他说话的态度，简直就是轻蔑乃至侮辱了。这是张居正从来就没有遇到过的。

从张居正进入官场以来，最有名的大佬，也就是严嵩、徐阶和高拱了。这三个人，都对张居正非常器重，无不高看一眼。

可是这位赵兄，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一头瘪蒜，居然如此对待他，张居正实在难以忍受啊！这一时期的张居正，很苦闷呐！

一向深有城府、自称不能轻易和别人说心里话的张居正，也忍不住给一些人写信，发起了牢骚。诸如“人心叵测，时事艰难”啦，“茹苦而不以告人”啦等等，用专家韦先生的话说，前所未有的挫折感，使得张居正颇是沮丧。

怎么办？束手无策，任凭别人骑在脖子上撒尿吗？这不是张居正的性格。

实际上，张居正连一个月也没有忍受，就采取行动了。

是不是拍案而起，和赵贞吉针尖对麦芒干了一场？不是的。

估算一下实力，张居正恐怕未必能够有必胜的把握吧？要知道，按照常规的斗法，高级领导干部间交锋，充当主力军和先锋队的，都是“议员”，而他的对手，那头突然冒出来的瘪蒜，兼任着“议长”啊！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 (3)

况且，真的这样干起来，在张居正看来，也未免太大众化、太小儿科了吧？这，同样不符合张居正的性格！

那是不是引退呢？惹不起，咱躲还不行吗？这是当时官场中人遇到难题时常常采取的以退为进的策略。

可以肯定，张居正有过这样的念头。他在给别人的信里明确表达过，说现在实在受不了啦，“惟当引去”！但是，估计，这也仅仅是一个念头而已！轻而易举不战而降，那能是他张居正的风格吗？

那会是什么策略？连环计是也！

当然，张居正也可能犹豫过，反复斟酌过。算来算去，还是这个计策最好！

那就是，积极斡旋，把下野两年的高拱请回来！或许有人会问：这是什么连环计啊？我告诉诸位，请回高拱，一举三得！

首先，证明张居正是个言而有信的君子，有利于巩固他和高拱之间的友谊。张居正曾经对高拱表白过，时机成熟时，要替他转圜，请他回来。现在，自己采取实际行动了，够朋友吧？尽管，张居正未必真的相信友谊，但是顺水推舟又一举多得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高拱一回来，必然会和赵贞吉发生冲突，不冲突也得冲突——有他张居正在暗地里做手脚，不怕他们不冲突，张居正有这个把握。一旦冲突起来，胜算的，绝对不会是那头瘪蒜！

最后，高拱一回来，李春芳的首相位置就算到头了。先让高拱出面，干掉这位老好人再说！

这些，不是我主观分析出来的，是有充分根据的。与张居正同时代的有心人，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沈德符，还有一个叫于慎行的等等，这些几乎与张居正同时代且谙熟内幕的人，几乎异口同声都这么说了。《明史·张居正传》也是这么记载的。

明史专家韦先生根据历代前辈提供的史料证据，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居正此一连环计算，是将高拱抬出来，并推到第一线，用以压制赵贞吉，俟机接代李春芳首相的权位，为高张携手执政铺平道路。”

那么，既然一举多得，为什么还说张居正会犹豫呢？

因为，张居正实际上未必想让高拱回来。他内心真实想法是自己急于当国执政，怎么可能会把一个强势人物请出来压在他的头上呢？连恩师徐阶，张居正也没有因为重于丘山的恩情，就手下留情，何况是友情呢？在张居正的心目中，所谓友情，是不是真实存在，即使存在，会不会长久？都是疑问！这是我的推论。反证就是：如果张居正真想让高拱回来，徐阶下台一年多了，为什么此前他不积极斡旋请高拱回来，而只是迫不及待地谋划自己“更上一层楼”呢？

既然内心不情愿，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还想出这样一个连环计呢？以我的判断，还不仅仅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这么简单。张居正一定反复算计过了，即使他不主动斡旋，高拱也必然会回来的！

最最关键的因素是，当今的最高领导人，对高拱的感情太深了，他是实在没有办法才不得不同意高拱下野的。高拱回家的时候，隆庆皇帝给他很高的礼遇，还专门派人护送，恋恋不舍极矣！自从高拱走了以后，这位天天想着美人儿的最高领导人，就像思念某个不能相见的美人儿一样，思念高拱不止！

据知情人于慎行的记载，当时隆庆皇帝同意高拱下野，实在是迫不得已，高拱一连递交了十二次辞呈，才“不得已策罢之”！另据和张居正几乎同时代、被誉为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之一的郭正域的说法，高拱被徐阶逼下台卷铺盖回新郑老家以后，“上思公不置”！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4）

张居正位在中枢，又曾经担任过隆庆皇帝的老师，对这个弟子兼上峰，他必是了如指掌的。这些情况，张居正不可能不清楚。

既然如此，那这位最高领导人在和美人儿厮混的间歇，突然想起要召高拱回来，就是很正常的了。这样的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

而且，这样的事，确实是不断发生。就说张居正曾经经历的嘉靖朝，被夏言取代的张首相，四次进出内阁；夏言也是在内阁四起四落。严嵩也曾经坐上内阁第一把交椅不久，又让了出来，后来才又重新坐上去的。部长们中间，这样的情况更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高拱复出，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很可能，张居正也还估算过，退一万步讲，即使自己不想请高拱回来，也还是轮不到他张居正坐内阁的第一把交椅！因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似乎没有这样的打算。

可以有把握地说，在隆庆皇帝的心目中，张居正似乎只是一个副手、配角的料，他对他并不看好。所以，尽管张居正违心讨好他，还是不能改变这位皇帝大人对张居正的角色定位。

对此，以张居正的明察聪慧，他不可能感觉不到。这样估算下来，请高拱回来，绝对是上上策了！

于是，张居正又出手了。他找到自己在裕王府的时候就结交到的“朋友”、当今皇帝身边的太监李芳，请他在皇帝面前为高拱说话。估计，张居正会把怎么和皇帝说，都想好了，让李芳鹦鹉学舌就行了。

或许有人会问，张居正是近臣，他直接找皇帝说不就行了，何必还这么麻烦呢？

是啊。张居正直接找皇帝说，也能找，而且一定也能够办成。可是，张居正不会这么做。那不是他的风格。

想想看，如果张居正直接出面，朝野很快就都会知道。那么，徐阶和徐阶的门生故旧怎么想？内阁里现有的另外几个人怎么想？张居正才不会干这种傻事！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别忘记了，这是张居正的准则！

而要想风险小，最好是不直接出头露面，隐身幕后，进退两便。况且，即使他张居正不直接出面，那也不等于说高拱本人就不知道是他在斡旋，他的功劳是不会被抹杀的。

那么，张居正都会教李芳些什么呢？

以我的推断，可能最关键的是说，万岁爷，您不是天天在思念高老先生吗？这事，我得跟您说道说道了。最近，我听说，当时赶高老先生下台，大部分人也是碍于徐阶徐老先生的面子，随大流而已，后来很多人觉得徐阶徐老先生那样对高老先生，实在过分了。现在徐老先生已经下野一年多了，让高老先生回来，不会有什么阻力了，就赶快让高老先生回来吧，只要高老先生一回来，把天下交给他去治理，万岁爷不就高枕无忧了吗？！

请高拱回来？这绝对是隆庆皇帝正求之不得的事，相当于正打瞌睡有人递过来个枕头，能不痛快答应吗？他不仅答应召高拱回来复职，还给了高拱一个意外的惊喜！

是啊，国家的事交给高拱，那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天天抱美人儿，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怎么交呢？现在李春芳是首相，总不能无缘无故免了他吧？事都是人来办的，管人的事交给高拱，那就等于把一切都交给高拱了。于是，这位一向以庸碌无为、胆小怕事著称的隆庆皇帝，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召高拱任内阁次辅兼吏部尚书！

隆庆三年底，在赵贞吉进入内阁三个月之后，高拱就回到了离别两年多的首都，愉快上任了！

在那个时代，沟通协调、办文传递，还要走各种程序，慢着呢！可是，算一算就知道了：从赵贞吉入阁到高拱复职到位，才三个来月

啊！可见，张居正的动作是很快的。

显然，赵贞吉一加入内阁，张居正感到不对劲儿，就立即开始出手了。所以，我判断，张居正对赵贞吉的容忍，不超过一个月！

由此可见，张居正这个人，对别人的容忍度不高。一旦他感到心里不舒服，前程受阻挠，那就会立即采取行动！而张居正的行动，又都是在幕后进行的，凡是有权谋用术之嫌的事情，他从不直接出头露面去做！

这，就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

那么，随着高拱的复出，就到了检验一下张居正的一石三鸟之计是不是能够圆满成功的时候了。

当然，高拱复出，张居正就赢了一回，在高拱看来，张居正确实是言而有信的君子，够朋友！这只鸟，已经收入囊中。

现在，要看看另外两只鸟，是不是能够击中了！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1）

随着高拱复出，情况复杂化了。

最重要的，是内阁的人事安排发生了变化。此前的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张居正四人内阁，一下子变成了李春芳、高拱、陈以勤、赵贞吉、张居正、殷世儋六人内阁。

这几个人，除了赵贞吉这个老干部，其他五个人，和张居正的关系，都有些特殊。或者说，除了赵贞吉以外，其他几个人都有交叉连环关系：高拱是张居正的生死之交；高拱和陈以勤是同年；李春芳、殷世儋是张居正的同年；陈以勤是张居正的老师；高拱、陈以勤、张居正、殷世儋都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当年裕王府里先后的同事；陈以勤、赵贞吉是老乡。再追溯一下，高拱、陈以勤、李春芳、张居正、殷世儋，在翰林院先后任编修，一起做过同事。

可是，这个内阁，却是充满火药味的内阁。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六人内阁就上演了一幕幕被有些史学家称为“混斗”的活剧。

一幕幕演下来，赵贞吉、李春芳、陈以勤、殷世儋先后鞠躬下台！

截止到现在，六人内阁集体出演、高超迭起、导致四人谢幕下台的一幕幕活剧，其“编剧”兼幕后总导演，不是别人，就是张居正。被张编剧兼导演看中的主要演员，则是高拱。

这些角色定位，不是我个人主观给他们分封的，是正史、野史中都明明白白记载的。当然，职衔儿是我根据他们的角色定位临时冠上的。

《明史·张居正传》是这样写的：“同列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殷世儋之见（被）逐，虽发自高拱，而机皆出自居正。”

当然，《明史》的记载未必都可信。但是，关于这一点，不是孤证，同时代的不少知情人，基本上都持这个说法。就连对张居正特别

推崇的明史专家韦先生也惋惜地说：“《明穆宗实录》记载的事实，《明史》《明书》《明史稿》《明通鉴》《国榷》等的评说，均持之有据，实不能为贤者讳。”

如果联系到张居正周旋请高拱回来的动机，给他定位为编剧兼导演，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吧！

当然，有了好的剧本、优秀的导演，只能说成功了一半，演员也很重要。应该说，作为主要演员的高拱，没有辜负张导演的希望，演出可谓圆满成功！

效果在那里摆着呢！李春芳、赵贞吉、陈以勤、殷世儋，都谢幕下台了！

就是说，另外两只鸟，也被张居正扔出的那颗石子儿给击中了：赵贞吉灰溜溜卷铺盖回家；李春芳的首相位置被取代；还撙草打兔子，顺带把殷世儋也赶下了台。

通过大量证据和演出过程分析，张居正张导演在指导这些高潮迭起的活剧时，总的原则是：隐身幕后，决不出场；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变化的是形势，不变的是权谋。

而且这场战役打了个短平快，一切都在张居正张导演的掌握中。

导演的把握很精准，演员的表演很卖力。以至于在内阁向“议员”通报政务推进情况的通报会上，堂堂的内阁“一把手”、年近六旬的高拱，差一点就吃了殷世儋的老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赶紧逃窜！这应该属于演员临场发挥，真是精彩绝伦，史所罕见了！

要说，高拱也算是老牌政治家了，年龄比张居正大一轮，登科比张居正早六年，是他的老师辈；高拱的同年陈以勤就是张居正举进士时的阅卷者，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就是老师；高拱这位师叔的学问、才干更是无与伦比。可是，出于政见、友情的考虑也好，或者说这个人太没有城府也罢，反正他就是被张居正当枪使了。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2）

“虽发自高拱，而机皆出自居正”，正史的这个说法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知情人支大纶又给我们提供了更加具体的证据。

支先生是张居正去世后几个月考中进士的。他这个人非常用心，搜集了许多中央高层的内幕材料，相信也采访了不少当事人。

据支先生的记载和高拱本人的回忆，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高拱一到北京，张居正就急急忙忙以老朋友的身份，兴高采烈地去看望他，高兴地说：“哎呀，中玄兄啊，你可回来了，我兄回来，小弟总算有了倚仗，哥哥你要再晚回来一两个月，咱们兄弟恐怕就见不到了啊！”

顺便说说，高拱字肃卿、号中玄。那个时候的人，晚辈或者平辈的人，就要称人家的号，而不称字。

不用说，张居正见到他的中玄兄，一定会把赵贞吉如何如何不像话、如何如何目中无人添油加醋数落一番的。

高拱对张居正的话，当时似乎是半信半疑，所以也没有更多表态，只是劝慰了这位好兄弟一番。

赵贞吉呢，见到高拱，倒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因为两个人都是干实事、有才华的干部，彼此很看重对方，“意气款密”。自然，他也会向高拱说到张居正。

赵贞吉评价张居正的话近乎恶毒。他说：“世所谓妖精者，张子其人也。”在赵贞吉的眼里，张居正居然成了妖精，看来这位老干部对张居正观感太恶劣，成见是很深的。

自然，老干部赵贞吉也免不了向高拱倾诉张居正如何如何构陷自己的内情。

赵贞吉说了些什么？似乎是这样一些定性的话，说张居正这个人太阴险狡诈，所谓“全以诈术驭人，言语反覆无实。人有不合者必两利

而俱存之，怒甲则使乙制甲，怒乙则使甲制乙；欲其斗则嗾之使斗，欲其息则愚之使息”。

当然，这些是高拱事后的概括，赵贞吉的原话，是不是这么说的，我们无从得知。

分析一下，这些话可以分四层意思来理解：第一层，全以诈术驭人，言语反覆无实，属于总的评价。与人交往，用的是诈术，说话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别人晕晕乎乎就信任他了。第二层是概括他的诈术的基本内涵的，即人有不合者必两利而俱存之，怒甲则使乙制甲，怒乙则使甲制乙。他对甲不满就挑动乙出面去整甲，对乙不满就挑动甲去整乙，别人两败俱伤，他两利俱存，好处都归他一个人！第三层是进一步深化对张居正权术的认识，欲其斗则嗾之使斗，欲其息则愚之使息。绝不绝？张居正要想让别人争斗起来，就能够挑动他们相斗，他要想让他们平息下来，就能够愚弄他们让他们停息！

请注意，这里说的“甲乙”也好，“别人”也罢，不是幼稚园的小朋友，也不是工地上的农民工，或者引车卖浆者流、大学生、老板，都不是，部长们恐怕也没有资格入围吧？说的都是些久历官场、宦海沉浮几十年的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核心人物啊！

不愧是知心朋友，高拱的概括非常精准。

事实证明，张居正确实有这个本事。不然，短短六年，八位政坛高手，包括他自己的恩师，为什么毫无例外、一个都不能少，都败在他的手下？！

不过，高拱当时还不可能意识到这些的，他对赵贞吉的话也不可能相信。他很纳闷，“难道我们分别不到三年，我的好兄弟就变成这样的人了吗？”所以高拱不会顺着赵贞吉说话的，他也对赵贞吉进行了一番劝慰。大家都在一起工作，现在领导上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应该同心同德，把工作做好——估计是诸如此类的话吧。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3）

或许正是因为高拱和赵贞吉两个人都是一心谋国、非常有责任感的干部，而且性情都很直率，所以在具体政务推进中，也难免发生分歧，甚至激烈争论。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支先生就认为这本来就是“豪杰之常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张居正投出的石子儿，不就打不中鸟了吗？

根据支先生的记载，张居正面对高拱和赵贞吉以豪杰相引，“意气款密”的情况，就有点坐不住了，于是施展其挑拨离间、火上浇油、“怒甲则使乙制甲，怒乙则使甲制乙”的诈术，“钩致其隐，文斗其中，以徼渔人之利”。

张居正到底是如何钩致其隐，文斗其中的，具体事例，我没有去查。但是以我也在所谓官场近二十年的经历特别是曾经遭受的挫折来看，觉得这似乎也未必是难事，就看你愿不愿意做了。

比如，那时候经常有“议员”弹劾内阁里的各位领导，张居正私下里可能会对高拱说，中玄兄啊，小弟我让人偷偷了解了，那个满嘴喷粪的家伙之所以无端攻击你，是赵贞吉那头瘪蒜在背后指使啊！也可能说：前天赵贞吉那头瘪蒜和他的几个狐朋狗友在翠花楼吃饭，一个个都在数落中玄兄的不是，说现在的吏部何等黑暗，又说用张三不对啦，不用李四绝对是胡闹啦！

总之，要想挑拨离间火上浇油，机会很多，借口不少。

果然，张居正“欲其斗则啖之使斗”的本事有了注脚，高拱和赵贞吉这两位才干卓著的前辈，在张居正的挑动下，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最后在隆庆皇帝对高拱的无条件支持下，赵贞吉不得不灰溜溜地卷铺盖回家！

李春芳一看情况不妙，也有些紧张了。他私下里找到了张居正，对他说：“高拱对徐老师都敢那样，何况我李某人？找个机会，请求皇

上准我辞职算了！”

可能是，李春芳考虑了以下的因素：张居正和自己是同年，又是徐阶的受业弟子，而自己也对徐阶执弟子礼；高拱是徐阶的政敌，高拱复出，朝野谣言四起，都说高拱必然报复徐阶，而张居正负有保护徐阶的使命。同时呢，张居正又和高拱是好朋友。所以，李春芳才找张居正摸底的。

没有想到，一向寡言少语、不露真言的张居正居然抢白李春芳这位学兄兼上司说：“如此，或许还能保全你的名声！”

这，或许是这位幕后导演唯一一次直接上场——如果可以称为上场的话？

听了张居正的话，李春芳愕然！心立即就凉透了！随即，就接连三次提出辞职，算是乖乖腾出了首相的位子！回老家潜心研读他所崇拜的王阳明的著作去了。

陈以勤本来就是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对内阁的交椅也持可有可无的态度，早在高拱和赵贞吉争斗最酣的时候，他觉得一个是自己的同年（高拱），一个是自己的同乡（赵贞吉），说话也不好，不说话也不好，算了吧，眼不见为净，第一个就卷铺盖回老家了！

最晚加入内阁的殷世儋，是张居正的同年。他本来就是“开后门”——贿赂太监——进入内阁的，名声不太好，威望不太高，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来，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有些恋恋不舍。于是，他就想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在内阁和“议员”联席会上故意找茬，竟然出手去揍高拱！

是不是张居正从背后挑动的，我不敢断言，知情人是这么说的，我们也就姑妄听之吧。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4）

事后殷世儋是不是很后悔，是不是怪自己太冲动，我们不去管他了，反正他那么做，肯定不好再待下去了，也不得不卷铺盖走人了！

如此这般，一年多时间，六人内阁，就剩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了。

更关键的还在于，朝野的观感是：高拱一回来，大前天赶走陈以勤，前天赶走赵贞吉，昨天赶走李春芳，今天又赶走殷世儋，未免太霸道，太不容人了吧？！而张居正呢？一定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吧？实在值得同情啊！不知道张居正该怎么和这样的人搭班子，说不定哪天也得被高拱赶走啊！

上述这些记载，有的出自正史，有的是当事人或者知情人的回忆，是不是都绝对可靠，我还不能完全说得准。我的老师、明史专家韦庆远先生，对张居正评价是很高的，说他是巨人、伟人、大改革家，但是对知情人支先生的记载，他似乎也拿不那么准。他的看法是：把高拱和赵贞吉及其他人的争斗，责任都推到张居正身上，不够公平；但是，张居正可能真的那样做了，历历有据，也不应该因为张居正是伟人，就替他把一切开脱。

另外一个相当于知情人的沈德符是倾向于认为张居正确实是那么干的。他感慨系之，说：“盖隆庆一朝，首尾六年，与江陵（张居正）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计次第见逐。……此公才术，故非前后诸公所及。”

简单说，沈先生是在感叹，所有的内阁同事，一个个都被张居正用计谋赶走了，可见张居正这位老兄的权术，实在太高超了！就玩弄权术来说，真是没有谁可以望其项背啊！

不过，尽管如此，我得额外说几句话。因为我在这里对这些高层人士的政见、政绩评述不多，由此判断起来或许就不那么全面，似乎这些人整天没事干，就是争斗！

争斗确实存在，而且的确也很激烈。但是，高层的争斗很复杂，评价标准也不能太单一。对高层人士的评价，参考各人的政见和政绩恐怕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不妨狗尾续貂，谈点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张居正这些做法，倘若从人品、道义上说，自然是无法谅解的。但是，若从国家大局上观察，李春芳、陈以勤的能力、水平和责任感，确实和他们所占据的位置是不相称的，把他们赶下台，免得碍手碍脚，大体上也还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就连赵贞吉这位老干部，虽然能力、敬业精神可嘉，但他的政见和高拱、张居正比起来，也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加上他又是一个不安定因素，对于高、张联手推行新政，是不利的，打发这位垂垂老矣的前辈回家抱孙子，也算说得过去吧？！

不管怎么说吧，事实是，转眼间，六人内阁，就变成了高拱和张居正的“双人舞”！

不幸的是，“双人舞”从起跳的时候开始，就差不多是强扭的瓜了。

两个“舞伴”，没有一个想跳这个“双人舞”！

当然，他们的想法，又各不相同。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1)

到了隆庆朝的最后一年，帝国的最高中枢机构里，只有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了。

是的，他们是肝胆相照的“刎颈交”。

但是，张居正不想跳“双人舞”，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个人独裁。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张居正心里也很清楚，要实现个人独裁，就要整垮高拱，而要整垮高拱取而代之，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面对现实，张居正在思谋对策。

借着这个机会，有必要隆重推出高拱这个人了。

以我的看法，有明一代，乃至此前的所有朝代，超过高拱的政治家，是不多见的。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他发挥才干的更多机会，“志不尽舒，才不尽酬”，抱恨终生！

以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四百多年前的高拱，我甚至认为，倘若高拱能够继续执政，像后来的张居正那样全权掌握国家达十年之久，那么，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改写，都是值得思考的。

那就先看以下高拱的简历吧。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和张居正“家世寒贱”（张居正语）不同，高拱乃生于官宦世家。张居正的祖父是“保安”，而高拱的祖父在中央做过司长（当时叫郎中）；张居正的父亲科举不顺，考了二十多年以秀才终，而高拱的父亲则是进士及第，在山东、陕西担任过地方官，后来又回到中央，担任过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直属机构“二把手”的职务。

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这一点，是张居正所远不及的。因为，“家世寒贱”的张居正不可能有什么严格的家教，虽然读书很刻苦，但是目的性太强——实在没有办法啊，就是为了考

试，属于典型的“应试教育”性质。估计连“课外书”也很少读，知识面是比较狭窄的。

不过，虽然家庭条件不同，家教和基础不同，但是其他的方面，张居正和高拱，就很趋同了。比如，他们都非常聪明，高拱“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张居正十岁“通六经大义，文字通顺”。

大体上，高拱和张居正，在小小年纪，就迈上了科举考试的“正道”。张居正十六岁中举人，高拱则是十七岁中举人，不过后者是全省的第一名。此后，高拱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而张居正则考了两次就中了进士。

此后，高拱的道路，差不多就是张居正的前辙。选为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虽然高拱进翰林院比张居正早六年，但是他们还是交叉了五年。就是说，其中有三年的时间，张居正和高拱，都在翰林院任编修，是同事。

和张居正不同的是，高拱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严嵩、徐阶，都没有特殊关系，也不像张居正那样巴结讨好过严嵩，相反，他甚至还讥讽过这位权势人物。

据记载，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有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的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哈哈一笑。

当然，高拱也没有参与两位主要领导的暗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高拱的祖父、父亲可能与严嵩、徐阶在早年有什么渊源？也可能就是因为高拱很有才华，已经出了好几本书，大家比较公认？反正严嵩和徐阶对高拱都比较器重，相与推荐他当了裕王（后来的隆庆皇帝）的老师。

这是以后高拱能够在政坛有所作为的基础。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2)

在裕王府九年后，高拱离开了，主持国子监。以后又担任礼部第一副部长、吏部第一副部长、礼部部长，在嘉靖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即嘉靖四十五年，由首相徐阶荐举，高拱进入内阁。

徐阶为什么举荐高拱进入内阁呢？这也是老资格的政治家的一个手腕儿。

因为最高领导人新老交替在即，作为即将接任最高领导人职位的人的老师，高拱进入内阁，势所必然。徐阶稍微提前一点行动，自然可以示恩于高拱。

但是，徐阶的如意算盘落空了。高拱并未因徐阶有举荐之恩就甘心当他的马仔儿，于是，不久他和徐阶的矛盾就公开爆发，仅仅一年时间，高拱被徐阶用计驱逐。

又过了近三年，在张居正的斡旋下，高拱复出。隆庆五年，李春芳下台，高拱接任首相。

实际上高拱在内阁的时间，还不到四年，担任首相也才仅仅一年。但是，他初步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如果有机会，说不定他会带领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不期然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为什么这么说呢？用大历史的视角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高拱是主张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一位叫牟钟鉴的学者研究了高拱的大量著作后说：“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徐阶和张居正都不及的。”研究张居正并对他评价甚高的专家韦先生由衷地说，他对牟先生的“此一论断，深有同感。”

那么，作为思想家的高拱，他的主张是什么呢？韦先生说，高拱“对宋明理学采取旗帜鲜明的批判立场”。要知道，宋明理学，是当时的官方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就其地位言，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所

说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他的理论勇气和思想解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了。

高拱有一句话，最能够反映他的与时俱进思想：“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

高拱是主张改革的。韦先生概括说，高拱“主张变制，坚持通过变法以求治。”而他的改革思想，就其内涵或者说走向来说，清末以前的传统社会的所有改革家都达不到，这就是“公开性”和制度建设。

就以干部制度来说，在他短暂的任内，对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而其主导思想就是“公开”。高拱认为“至公”是真理，“公”才立得住，经得起历史检验。而要“公”，就要“开”，即不能暗箱操作。比如，过去，吏部任用干部，只是部长和司长私下研究敲定，十分隐秘。高拱说，这样做，“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于是，每当需要任命干部，就命人当众打开所有名单，大家发表意见，就是部长本人“欲有所私而不能”。而且，凡是职位空缺的，都要在机关外面公告之，使大家都看到，以广泛推荐并监督补缺人选。

高拱还特别注重制度化，在他主政的吏部，短时间内便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

高拱是主张开放的。在高拱主政的短暂时期里，就打破了禁海政策，造船只、开海运。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开海运，就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相抵触了。保守派、既得利益者和理想主义者，都对高拱的主张予以抵制。他们说开海运风险太大，如果海运能够搞，祖宗都是傻瓜吗，他们为什么不搞？

张居正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针对高拱强力推行开海运的做法，他给朋友写信说，“仆忧虑（我还担心）海禁一弛，他日更有可忧者”。张居正忧什么呢？那就是担忧闭关锁国的国策被打破！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3）

这不是杞人忧天。

高拱实际上有这样的主张。不仅要开海运，还要开国门，实行海外贸易！他清楚地说过，东南沿海倭寇之患，实际上真正的日本人不多，绝大多数的所谓倭寇都是中国的海商，被海禁政策所逼迫，只能“连结远夷，向导以入”。如果允许商人自由开展对外贸易，那么一方面繁荣工商，另一方面也是肃清倭患的治本之策。

专家韦先生也认为，按照开海运的政策运行下去，必然带来对外贸易的繁荣，那整个局面都有可能焕然一新。

想想看，要是高拱的这个主张得以贯彻，会是什么局面？

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正是15—16世纪（恰就包含了高拱、张居正时代）西方的航海活动，拉开了现代历史的大幕！正是海运的大开，最终促使西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而当时的中国，造船的技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和实践，都是西欧所难以比拟的。

不仅如此，中国沿海的民间航海、贸易的积极性很高，其机制也与同时代西欧有相似之处。唯一的差别就是当局的政策。高拱就是要打破这个政策。

不过，张居正执政后，立即又推翻了这个政策。

除此之外，包括结束与当时北方的异族长达百余年的战争状态，实现“互市”即双方贸易往来，也是高拱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极力促成的。

这两点，都是在当时条件下，高拱开放思想和政策的具体体现。

高拱对发展工商业，特别重视。可以说，高拱对朱元璋的重本（农）抑末（商）政策是有不同看法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他对发展工商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刚刚复出回到北京时，很可能是利用春节的空隙，作为帝国中央事实上的领导核心的高拱，曾亲自到市场调查研究。好像是他一个人微服私访，没有前呼后拥，也不可能有提前

安排见谁，教相关群众对来的领导说什么，所以他是很深入细致的，也确实了解了实情。他和商家交谈，具体了解国家政策、政府管理有那些问题，做生意有什么障碍等等。随后他又亲自撰写报告，从国家金融、货币政策到对市场的具体干预行为，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应对措施。

帝制时代，像高拱这样作为执政者，对工商业进行过那么细心的调查研究、倾注过那么大热情、并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出台改革措施的，可能绝无仅有。

可惜，历史没有给高拱更多的机会。

用大历史观来审视，我可以这样说，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张居正是官僚、政客，实用的保守主义者。

那么高拱这个人，在当时的官场，大家是怎么样看他的呢？

据记载，高拱这个人，相貌瑰奇，为人豪爽。这说的是高拱的外表和性格。但是，据说，高拱虽然相貌瑰奇，似乎不修边幅，胡子特别长也特别多，有“高胡子”的外号。

高拱是廉洁自律的高级领导干部。虽然高拱出身书香门第、干部家庭，本人又没有家庭负担（既无父母需要赡养又无儿子），却“家徒四壁”，生活很简朴。据知情人的记载，高拱家的生活水平，甚至还达不到当时的“中产阶级”的档次，处于“寒士”阶层。这在当时腐化的氛围里，是不多见的。

高拱非常勤政。所有的史家都公认，高拱这个人，尽心国事，英锐勃发。在内阁，高拱实际上是核心人物，日理万机，还兼任吏部的部长，责任巨大，掣肘众多，“晨理阁务，午视部事”，十分勤勉。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4）

高拱是非常有才干的领导。无论是不是喜欢高拱，对他评价如何，但是没有人不承认，高拱能力卓越，胆识超群，务实能干。他在短暂担任礼部部长期间，“科场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尽。”在吏部当副部长，即“吏事精核”，“每出一语，奸吏股栗，俗弊以清。”

高拱开诚布公，不阿私党，是知人善任的领导。说高拱在使用干部上一点没有亲疏远近，可能未必是事实。说他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那只能说是诬陷。史家盛赞高拱“当国时一贯开诚布公，不阿私党”。在重要岗位、关键干部的使用上，高拱是很注意的。像知识化、专业化水平很高的朱衡、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杨博，高拱并未因为他们曾经公开反对自己就弃之不用，而是重新启用，安排合适的岗位；名将谭纶、地方官王宗沐、殷正茂、张学彦等，都受到高拱的重用。专家考证说，高拱任用的重要干部，“称职率是很高的”。当时的舆论也称赞高拱“善用人”。

高拱这个人，虽然是出身干部家庭，却特别体察下情。这里，不妨以他对边防事务的改革为例，简单说说。

高拱这个以改革统领施政的政治家，对防务很重视，一上任，就着手革除宿弊，并且首先把眼光放在军事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改革方面。

当时的军事首脑机关是兵部。按照六部每部一部长、二副部长的“祖制”，兵部历来也只能配副部长二人，协理部事，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逐步升迁的文官。平时，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很少巡阅边务，接触部队。但是，一遇边防总督（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员）缺员，按惯例就要副部长前去顶补，但这些人上任后根本不谙边务，处理事物只能是事倍而功半。

高拱改革体制，冲破祖制，在兵部添设两名副部长，这两个人不理部务，职责就是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充分做到对边防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弱都熟悉起来。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缺员，即可往补。

高拱还认为，“兵乃专门之学”。当然，这里的兵，是军事的意思。军事是专门之学的说法，现在大家都不否认。可是当时认识的人不多。所以当时在干部选用上，兵部和其他五个部是混同的，兵部系统用人没有特殊资格限制，优秀将才又常常调任，为此，高拱建立了选将备才制度，并规定不得将其随意调动到其他部门。副部长和总督（大军区司令员）则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

经过调查研究，高拱认为，边防干部，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甚至不如内地处和平环境者。高拱以为这极不合理，于是出台政策，对边臣给予优厚待遇，使其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

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又注意到边境地区在防卫上有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充任这些地方官的，不是杂流，就是受到处分的干部。中央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高拱于是改革边境地区干部选用制度，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充任，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破格提拔。按照高拱的话说，对于这些干部“惟以治效，不循资格”。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5）

经过这些改革，国家的防务力量大大加强。

高拱政绩卓著。即使是短暂的任期里，在激烈的争斗、多方掣肘的环境下，高拱仍然办成几件大事，政绩卓著，举朝公认。

据专家韦先生研究的结论，“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订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在任职的两年半中，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不过，高拱在任时，还没有来得及在包括干部制度在内的政治改革上有更大的作为，所以他最大的政绩或者说贡献，并不在这里；而是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无比的胆识、高超的智慧，一举结束了持续一百余年的对外战争状态，实现了和平、开放了贸易（容后述之）。

高拱属于性情中人，非常看重感情。不幸的是，这竟然成为了他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一点，在以后我们会看到。

总之，高拱是罕见的德才兼备、胆识超群的政治家。

如果说高拱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太耿直，胸无城府，直来直去，工作方法上，又比较简单粗暴。可能还存在不谦虚甚至居功自傲的毛病。有记载说，高拱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口怒视，恶声继之。

以我分析，高拱自己很敬业很辛苦，每天累个半死，其作风又是雷厉风行，可是官场风气却是混一天少两晌，推诿扯皮；高拱自己自视甚高，对别人写的东西、提的建议、办的事情，容易看不上眼；高拱自己要求很严，官场上却是腐化盛行。所以他容易急，见了怂人压不住火。

想像一下，高拱这个人心里存不住事、脸上压不住火，一旦惹他不高兴，就可能当场脸红脖子粗地拍桌子骂人。可以断定，高拱这个人，脾气不好。加之他的相貌又不一般，胡子茂密绵长，可能还有些

零乱，既不像张居正那样儒雅俊朗，又不像严嵩、徐阶那样和蔼可亲。所以，大家都觉得高拱属于不怒而威的领导。

高拱这个人虽然才干超群，胆识过人，可是似乎缺点心眼儿，那就是毫无防人之心，耳根可能还比较软，容易受人挑拨，被别人玩于股掌而不自知。所以既不会搞团结，更不会搞斗争！以我的判断——从他以后在阴谋的陷进中挣扎的过程来看，高拱还有点死心眼儿，或者说，认死理儿。

本来，高拱学问挺好，口口声声说要与时俱进，要通权达变，可是当他自己的前途和生命遇到威胁时，却没有考虑变通，总认为正义、真理在手，总会有公正的一天；一条道走到黑，彻底跌进别人在他眼皮儿底下挖好的大陷阱！问题是他明知道别人在哪条道上挖了陷阱，可是他认为这条道是正道，我必须走正道，跳进去就跳进去，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

本人也在所谓的官场混了近二十年，虽然没有接触过高层，但是这个类型的领导还是遇到过的。以我的切实观感，这样的领导人，是容易得罪人的。不过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摸透他的脾气，就好了。大家适应了、理解了，会跟着他好好干的。毕竟，这样的人，心眼不坏，心术很正，不虚伪，不作秀，不谋私，而且人家有才干，有思路，有作为，有政绩，以身作则，一心扑在工作上。要是这样的领导不是好领导，那什么样的人才是好领导啊？！

所以，高拱在干部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

当内阁里的同僚纷纷被淘汰出局以后，一直隐身幕后，导演了一幕幕活剧的张居正，所要直接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到现在为止，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里，谁都知道，张居正和高拱是好朋友。那么，既然把别人都赶走了，垂拱而治的最高领导人，差不多只是橡皮图章，两个好朋友，又都是有抱负、有才干的实干家，他们联手执政，是多么好的机遇啊！

善良的人们，有理由感到庆幸，对他们同心同德、共赴时艰寄予无限的期许！

但是，中央高层，玄机重重，不在其中者，实在难窥其一斑！甚至，就连当事人，也未必都清楚各种玄机。那些只知道干事而不知道琢磨人的高层人士，注定要一步步迈进阴谋的陷进！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 (1)

要说起来，内阁“双人舞”，曾经是高拱和张居正的共同理想。他们曾经为此“相期约”。那还是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高拱和张居正，满怀豪情，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操权握势，大展宏图。他们的友谊，曾经那样深厚，那样令人欣羡。

是的，高拱和张居正，确实是朋友，而且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为彼此能够成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生死之交、金石之交、同道同心、肝胆相照、刎颈交、胶漆金石不足比拟等等，都是他们各自或者是知情人来描述两个人的关系时使用的。

要说，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个人，性格、人品，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他们两个人，又都自视甚高；况且，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一个属相，但是相差整整一轮，就是说，高拱比张居正大十二岁，科举登第也早六年，在那个讲究资格的年代，高拱属于张居正的前辈。他们怎么可能成为那么好的朋友呢？

那只能说，志同道合之故也！

确实，这两个人，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有才干，有抱负；都对现实不满，都主张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因为志同道合，连彼此天壤之别的差异，也可以忽略不计，成为“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

我们有理由相信，张居正和高拱，在翰林院的时候就应该熟悉了。据高拱的回忆，张居正在翰林院任编修，“年少聪明，孜孜向学”，高拱可能好为人师，在他面前侃侃而谈，张居正也挺爱听，而且“多所领悟”，于是高拱“爱重之”。就是说喜欢他了。可能比喜欢还要多层意思？器重加喜欢？这话，似乎有点居高临下，透露出他们的关系实际上不太平等。

的确，高拱就自称，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在乎师友之间”。

张居正呢，对高拱很敬重，觉得从高拱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他也确实对别人说过，自从和高拱交上朋友，“长多少学问见识”！就是

说，张居正也认同，他和高拱的关系，亦师亦友。

不管怎么说，反正两个人很谈得来，谈论时局、商榷治国之道，废寝忘食，甚至于“至忘形骸”！

后来高拱离开翰林院，去给未来的最高权力继承人裕王当老师，估计张居正也还和他保持联系的。而且后来张居正也追随高拱的足迹，当起了裕王的老师，两个人又一起在国子监担任正副“校长”，张居正第一次正式成为高拱的助手。其间，高拱担任《永乐大典》的总校官，张居正任分校官，还是在高拱的领导下一起工作。

在嘉靖和隆庆朝交替之际，两个人前后相差一年左右，进入内阁，又当起了同事。关系越来越好，用高拱的话说，“久而益加厚焉”！

这期间，可能就是在国子监的时候，两个人朝夕相处，对当时在位的嘉靖皇帝和严嵩领导下的国家很是失望，也忧心忡忡，彼此之间就免不得相互抒发了自己的远大抱负，而且“相期以相业”。就是准备当国执政，携手治国。不过张居正比较谦虚，他告诉高拱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即时摆出，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那是老兄你的事，小弟我做不了。但是，老兄你是个急性子，恐怕有些事是需要有人给补补台，如果让小弟从旁襄助，那小弟敢不效力？

这席话，说得高拱热血沸腾，挺受用的。觉得自己交的这个朋友实在太值得了！很可能，诸如此类的话，张居正经常会说出来，让高拱感到，张居正确实是自己的知己、“金石之交”！在以后的岁月里，高拱一直相信这些“相期约”的话，并且在处理和张居正的关系时，也是以此为圭臬的。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 (2)

直到徐阶将高拱排挤出内阁，下野回老家赋闲，两个人还书信往来不断，所谓“各相望不忘”。显然，高拱确实未因为张居正作为好朋友没有替他说话而对其产生怨气。看来，高拱对朋友是很体谅的。

当然，随着高拱的复出，事实上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在从张居正那里得知了徐阶的下台乃是他的好兄弟幕后操作的，他自己的复出也是好兄弟从中斡旋的结果后，高拱对张居正就更加信任，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更加亲密了。

也难怪，作为堂堂的国家最高中枢机构事实上的主持者的高拱，居然就让张居正当了枪使呢！

但是，一个时期里，高拱并不认为他被人当枪使了。无论是在和赵贞吉、李春芳、殷世儋、陈以勤等等的争斗中，还是在处理国家重大事务、任命重要干部方面，高拱觉得，张居正和他，都是同心协力的。很可能，高拱感到，这正是在为他们当年“相期约”的理想愿景而奋斗呢！

高拱的感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复出后的高拱，事实上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大政方针的决策和干部任用的决定，都是和张居正商量的，两个人携手，开启了为时十多年的隆（庆）万（历）新政之局。

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高拱和张居正联手处理的边防大政。这一点，有必要展开详细说说。

明朝的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对中原威胁很大。最有名的就是明朝称为鞑虏和建虏（满洲）的两支。为了抵御入侵，明政府在北边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等九镇，谓之九边，或许可以理解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九大军区。

在高拱、张居正生活的年代，满洲还不太成气候，心腹大患是所谓的鞑虏。而其中最大的部落，就是俺答部。高拱、张居正还是中级

干部的时候，俺答曾经率兵突破重重防线，围困北京。刚刚建设好不久的地坛，当时也被俺答的兵士付之一炬。以后，俺答部又多次兵临城下，堂堂天朝大国的首都，动不动就要戒严。宣府、大同及再向西的一些地方，包括今天的长治一带，更是天天受到俺答部的侵扰抢掠，成了他们不花钱的物资供应基地！

另一方面，帝国的国防，可以说绝大部分兵力，都投入到了北部边防，可是还是不能保证北边的安全。岂止不能保卫边防，连首都的安全也保卫不了！而且，要知道，那么多的兵力，那么多的防卫设施，那么频繁的战事，都是要花钱的。国库里的钱，都花在这上边，还是不够。张居正曾经算过一笔账，大体上说，把国家所有的收入都投到北部边防上，还有四十万两（银）的缺口！

可以说，这个问题，像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国朝执政当局的心上。屈辱、焦虑、不安，折磨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高级干部。张居正就在给朋友的信里感叹说：“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日夜忧之，奈何！奈何！”

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受到意识形态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约束，一般人都不敢提罢了。什么意思呢？

情况是这样的：简单说吧，俺答率兵内侵，并不是要推翻大明王朝取而代之，他所要求的是开放边贸。因为塞外荒凉之地，游牧民族的粮食、布匹这些生活必需品奇缺，需要从中国（当时的说法）获得。如果能够开边贸，他们就可以拿马匹牛羊交换这些生活物资。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互市。但是，中国不答应开边贸，他获得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方式，就只能是战争，通过战争抢掠。那一次打到地坛，围困首都，他提出撤兵的条件，也就是要中国同意开边贸。而且，俺答还有点了解中国国情，他把自己摆得很低，说是请求“封贡”“互市”。意思说，能不能把我当成中国的部属，让我给朝廷上贡？能不能同意开边贸？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 (3)

但是，在“爱国主义”者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什么理由呢？其实也不复杂，他们的意思，简单说，就是我们中国是天朝大国，鞑虏是化外蛮夷，如果和他们“互市”，那不就是双方平起平坐了吗？尊严何在？国格何在？况且，作为近百年来的敌国，彼此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不就是我方不战而屈了吗？对敌人言和平，就是投降主义！就是卖国贼！谁敢担这个罪名啊？还不仅仅是罪名问题，众怒难犯啊！倘若谁真的这么干了，那就有被赶下台的危险。

战，打不赢、撑不住；和，不敢、不能。这不是死胡同吗？

谁说不是呢？连张居正这样精明的领导人都连连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就是在死胡同里钻不出去的感觉吧？！

高拱复出，虽然不是首相，但是实际上他是核心。这个不奇怪，我们中国有这个传统，排在第一位的未必是核心。

既然高拱是核心，那他就不得不将筹边视为己任，立即着手改革军事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周密部署防务，并且确实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根本问题，也就是战争状态，还是持续着。

突然间，转机出现了。

这个转机，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具有偶然性的突发性事件；另一个，具有远见卓识、谋略过人的超一流的政治家在决策层有了较大的发言权。如果没有前者，后者无从着手；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也是枉然。

那么，什么偶然事件呢？说起来，这样的事情，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比较难以相信。可是，在当时的鞑靼部落，却真实的发生。

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都叫她“三娘子”。这个女人国色天香、智慧过人，被许配给了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为妻。可是，作为祖父的俺答，似乎垂涎三娘子的美貌，硬生生夺孙所爱，据为己有！简

单说，就是爷爷和孙子争风吃醋。把汉那吉拿他的祖父没有办法，又不甘心，一气之下，跑到宣府，叩关降明。

这样的事情，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也和俺答有关。上次，是他的儿媳妇，因为和自己的“警卫员”通奸，被老公发现了，于是就跑到大同叩关请降。当时高拱、张居正者辈，权不我操，只有旁观的份儿。彼时是严嵩当国，对这件事的处理不太妥当，引起了不少议论。高拱和张居正当时也私下议论过，对当局那样的处理，“为之齿冷”！

那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该怎么办呢？根据上次的教训，这个把汉那吉，不啻是烫手的山芋！

但是，现在不同了。就在九个月前，高拱被隆庆皇帝请回中央，虽然不是内阁的“一把手”，然则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却超过了内阁的首相，是核心。现在，历史不仅不会重演，还要创出新局。

当时，主政大同地方的“一把手”方逢时、军区司令员（总督）王崇古，报告了情况，提出了建议，即接收把汉那吉。报告一上来，高级干部莫衷一是，但是主流意见是：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但高拱找到张居正，两人商量的结果是：奇货可居，将有大用。于是，高、张二人排除阻力，决定加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花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为此，高拱和张居正，都频频给第一线的军政干部写信，指导方略，解释政策。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 (4)

消息传到边外。那个夺了孙子媳妇的俺答，被自己的正房老婆逼着要孙子，正急得抓耳挠腮，得知中国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中国和好，请求“封贡”。

收到“国书”，帝国的中央，一片哗然！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

张居正则毫无保留地站了高拱的立场上。并且，很可能给高拱出谋划策，建议他如何对付强大的反对派。毕竟，这方面，是张居正的长处。高拱运筹帷幄，排除阻力，大胆决断；张居正精心谋划、大力襄助，共担风险，终于达成了他们预期的目标。

以此为契机，双方实现了“封贡”和“互市”。中国朝廷以“天朝上国”的地位，授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则承诺归顺服从上国，并每年向朝廷进贡马匹若干，以此换取开放边贸，允许他们以牛羊马匹换取粮食、茶叶等物品。此外，俺答还不得不同意把中国通缉的几名大汉奸交出，事实上是用来交换其孙子把汉那吉。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自此以后，鞑虏之患特别是最强大的俺答部落的侵扰之患，基本上解除了。而在“互市”的边境地带，外长城上的大境门，见证了当时繁荣的景象，一个边陲商埠——张家口，也可算作间接的成果，为和平、繁荣作证。

不用说，高拱本人对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很满意甚至自豪的。这也是高拱和张居正两个好朋友携手合作、同心协力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但是，高拱可能未必知道，张居正私下里在散布，这件事的成功，完全是他个人的功劳。按照对张居正非常推崇的专家韦先生的话说，张居正“颇有将封贡互市的实现，完全居为己功之意”。这些，都是张居正当时写给有些人的信里，明明白白透露出来的。他甚至还不谦虚地说，办这件事，三计只用其一，就达到了这个效果。

这是个不祥的讯号：张居正不认为他只能做高拱的副手；而且已经不愿意继续做高拱的副手了。

张居正的信所表达的意思似乎是在说明，高拱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是做了那件事吗？你以为真是他高拱做的？没有我张居正，这件事，办不成！而办这件事对于我，实在是小菜一碟儿，我不过是牛刀小试一把而已！

实际上，从高拱复出之日起，张居正就已经留了后手，预为铺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张居正并不是真的因为他和高拱曾经的“期约”而盼望其复出的，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早就急于“更上一层楼”了，而且念念不忘这一点。所以，张居正不会不慢慢为其真实目的做些铺垫。

比如，刚开始，高拱是很感谢张居正的，也是想和他齐心协力共同实现他们曾经的愿景的。所以，高拱遇到重要干部的任免，就会找张居正商量。

顺便说一句，那个时候，内阁是没有人任免的职责和权力的。重要干部任免，不需要甚至可以说制度上是不允许内阁干预的。

但是，高拱是领导核心，又是吏部部长，涉及重要干部的任免，他愿意咨询谁，别人也没有办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名将谭纶、地方官王宗沐、殷正茂、张学彦等的任命，高拱一定征求了张居正的意见，甚至，其中也有的可能就出自张居正的推荐。

这下好了，渐渐的，到张居正那里活动的人多了起来。当然，那些到张居正那里活动的人，去拜访堂堂的阁老，又是当下领导核心的铁哥们儿，是不会空着手去的。

为什么他们要找张居正活动呢？因为找高拱，不好办，那老兄不怒而威，又两袖清风，谁敢找他活动啊？而张居正，是领导核心的铁哥们儿，家庭负担挺重，也需要些外快，只要去找，他还真见！

有道理。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事实上，当时官场都在传，张三李四，他们为什么得到各自的位置，那是张居正向高拱推荐的结果。

还有，王五赵六为什么丢了官，是高拱不满意，张居正再三向他说明情况，希望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可是高拱就是不听。

这个传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反正受到提拔的人觉得张居正是恩人，以后要报答人家；遭到撤职或者降级的人，感到还是张居正这位领导不错，尽管事情没有办成，但是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子曰：没有不透风的墙。实际上这话好像不是孔子说的，不过孔子的话挺让人信服，既然不知道谁说的，就当是孔子说的算啦！我的意思是说，官场上的传言、张居正接受跑官人的贿赂等等这些情况，高拱慢慢也就知道了。

其实这不难理解。即使是高级领导干部，谁没有一些耳目啊？况且，那个时候，像高拱、张居正这样的领导，都当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副主考，门生都有几个。他们地位不高，上蹿下跳的本事挺高，或者替领导兼老师散布点消息，或者打探点情况，屁颠儿屁颠儿跑去报告，再正常不过。

高拱倒是没有因为这些事质问或者批评张居正，可能是考虑面对的对手挺多，工作不少，还要这位贤弟大力襄助，就别太和他较真儿了吧！不过，从此以后，高拱也就不再就干部问题，和张居正共同研究了。

但是，官场上，示恩收恩，或者给哪个人抹点儿黑，机会多的是，只要想做文章，素材绝对大大的有。关键就是看你的良心允许不允许你那样做了。

当然，这事有人会做的。不然，不就风平浪静了吗？那摸鱼的人不就傻眼了吗？！

两利俱存独持其柄 (1)

张居正的权力之路，注定要和徐阶、高拱这两个人，紧密纠缠在一起。而且，恰恰是张居正处理和徐阶、高拱（尤其是他们下台后）的关系的做法，对他的人性、人品、人格是最大的检验！

好了，回到高拱刚刚复出、张居正为了更上一层楼正在慢慢铺垫这个时期。徐阶的事情，这时摆到了高拱和张居正的面前。本来，随着徐阶的下野，他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上层的矛盾纠葛，应该不再和他有什么瓜葛了。可是，事情却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所以，现在，我就不得不回过头来，讲一下退休老领导徐阶他老人家了。

当高拱复出的消息传到遥远的苏州，曾经久历官场、宦海沉浮近半个世纪、年近七旬的退休老人徐阶，惴惴不安起来。学生兼接班人张居正给他传递过来的讯息，更增添了这位老领导的烦恼。说烦恼可能过于轻描淡写了，退休老领导徐阶，这时可能死的心都有！

那么，张居正传达给他的前恩师的是些什么讯息呢？综合起来，就是他可能对徐阶说，高拱这个人，有仇必报，他对徐阶赶他下台的事耿耿于怀，念念不忘，摩拳擦掌，准备秋后算账啦！

当然，这些讯息，不仅徐阶知道，而且整个朝野都知道了，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惊魂未定的老领导徐阶，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为什么说徐阶惊魂未定呢？那就不能不说说海瑞了。

海瑞骂皇帝，痛快了一场，坐牢了半年。被骂的皇帝呜呼哀哉，海瑞光荣出狱，以举人出身，得以破格升迁。随后，又被任命为应天巡抚，相当于省里的“一把手”。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展开了整治豪强大户的运动。而且海瑞处理政务、审判案件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穷人和富人闹纠纷打官司，必是富人没理，受处理的是富人而不能是穷人。

贫富不均，为富不仁，那是最容易引起老百姓反感的了。所以海瑞此举，自然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加之这位仁兄骂皇帝的事迹早就流传天下，海瑞一到，老百姓都说盼来了青天！响应海瑞号召也就特别积极，举报信就像雪片一样，飞到了海领导的办公室！其中，举报最集中、反映最强烈的，就是老领导徐阶！

事实摆在那里了：徐阶家族，在乡里大治产业，光田地就达到二十多万亩！老领导本人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

可是，徐阶可是海瑞的救命恩人啊！当年，倘若不是徐阶尽力维护、悉心调处，以嘉靖皇帝的性格，痛骂他的海瑞，早就命丧黄泉了！

这是不是很棘手？海瑞难办了吧？老实说，提出这个疑问，又是一般人的想法！海瑞也不是一般人啊！

不过海瑞的不一般，和张居正有很大不同，他的不一般皆摆在桌面上，晒在阳光下，体现在严格执法上。所以，海瑞发表了公开讲话，说：“法之所到，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用现在的话说，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管你是什么总理、部长，都不能法外开恩！

光听海瑞这些话，其实未必就说明他不一般。领导干部新到任，往往说些非常冠冕堂皇令老百姓感激涕零的话，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海瑞这个人，向来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

言行不一、说完拉倒，可能还没有麻烦，真要说到做到，那就容易出问题了。先是，海瑞以强硬的态度，命令徐阶把其家族二十多万亩田地，退出来至少一半以上！徐阶迫于压力，不得不退出一小部分。

两利俱存独持其柄 (2)

原以为给海瑞个台阶下就行了，没有想到海瑞这位老兄不依不饶，命令徐阶要继续退田！徐阶当然就不高兴啦！过分了吧？以怨报德啊你？

拒绝执行！徐阶下了决心！

海瑞寸步不让，跟我玩这个？看谁玩过谁？他下令动用强制措施，对老领导家族“痛裁之”！老领导徐阶震惊之余，“大不堪”！

但是，以徐阶的声望、在中央的人脉——门生故旧何其多哉？他会善罢甘休吗？“你以为退休的领导就可以随便欺负吗？”徐阶很可能这样想，“太小看退休老人了吧？！”

接着，海瑞的麻烦就来了。当然，不会是因为海瑞欺负退休老领导这个理由，随便找点什么破绽，没有捏造点也未尝不可，比如工作不够稳妥啦，脱离实际啦，鱼肉缙绅啦，沽名钓誉啦，都是“罪名”，反正一时间参劾海瑞的参折，不像雪片，也差不多像春天的杨絮了！

从中央传来的消息，对海瑞也很不利。这个时候，赵贞吉已经入阁了，内阁里的四个人，无论是李春芳、赵贞吉、陈以勤还是张居正，都对徐阶有感情，海瑞如此欺负老领导，他们一定会碰头通气的。于是，要调动海瑞工作的事，被纳入了议事日程。或者说，已经定下来了，只差办手续了。

海瑞手下的干部也不干了！想想看，有几个干部会是真正的穷人呢？你这个领导，偏向穷人也就罢了，可是不能走极端吧？现在中央要换马，大家都巴不得，还会真心实意为这样不得官心的领导卖力吗？

海瑞的处境，很快就变得艰难起来，可以用进退维谷来形容。

高拱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张居正的催促下，冒着严寒，不顾雪厚路滑，日夜兼程赶到首都上班的。

或许有人要问，你说这些，这和张居正有关系吗？是啊，我也这样问。老实说，这事，以讹传讹久矣！谜底到现在还是没有揭开。

干脆说清楚吧！我觉得，派海瑞去徐阶的家乡当“省委书记兼省长兼高级法院院长”应该是张居正的主意。因为，海瑞的任命下达的时候，中央里说了算的，就是张居正。

那个时候，是隆庆三年的六月，高拱下台两年、徐阶下台一年、赵贞吉要两个月后才入阁。而赵贞吉入阁以后才有高拱复出的幕后酝酿，现在根本连影子也没有。内阁里就是两个老好人（李春芳、陈以勤）和一个雄心勃勃的张居正。而李春芳、陈以勤和徐阶的关系都很亲密，都主张不折腾，务求稳定，你好我好大家好！对清查田亩、打击豪强，这两位老兄是不会赞成的。对用海瑞这样的干部主政一方，他们是不放心的。

这件事，我是说任命海瑞去徐阶的家乡当省领导，除了张居正，别人都未必做得到。即使任用海瑞是别人提议的，如果张居正坚决反对，估计也成不了。因为，当时干部们对张居正“畏惮之，重于他相”，在内阁里，“张居正实际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例外或许有，但是，我相信，海瑞不会“走后门”——去给太监送礼买官！所以这个例外也是不存在的。

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张居正是早就忍受不了死水一潭的局面了。而且他是主张打击豪强、清查田亩、抑制土地兼并的。其次，张居正对徐阶的家乡印象很差，给朋友写信说，那个地方是“鬼地”，最难治。复次，张居正不喜欢海瑞（张居正执政十年间海瑞一直在家赋闲，张居正死后第二年就复出，应该是明证）。也是，像海瑞这样的干部，就是典型的“刺儿头儿”，不巴结讨好领导不说，还天天出难题，是不安定因素；首都有这样一个“刺儿头儿”在，难免唧唧喳喳，说东道西，这是张居正所深恶痛绝的。现在张居正还没有名正言顺当国，但是他实际上在推动全局工作，那最好让海瑞离远些。

两利俱存独持其柄 (3)

让一个他所不喜欢的、爱唧唧喳喳的人到一个他所不喜欢的地方去，“以难之”，是符合张居正用人的一贯思维的。他掌握全权后常常这么做，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

还有没有别的因素？比如，海瑞到徐阶的家乡折腾，徐阶必然要有求于张居正，他就可以示恩于徐阶了。这个姑且存疑。诸位可以根据张居正的一贯表现作出自己的判断。

不管怎么说，让海瑞去徐阶的家乡任职，对张居正来说是一举多得的事！

事实也是这样。当海瑞毫不留情收拾徐阶的时候，一批又一批送礼的人从苏州赶往北京。徐阶和张居正“热线”联系不断。到海瑞在吴地折腾得差不多了，张居正也就该收手了。

这个时候，高拱复出，到内阁上班了。惊魂未定的徐阶，在不断接到张居正和他的“联络员”传来的消息后，坐卧不安！

顺便说说，所谓“联络员”，是我用的现代名词。徐阶回老家以后，在北京还有亲属、子女，也开有商场店铺，京—吴（代称苏州）之间来来往往不断。打探消息的，疏通关系的——徐阶的弟弟等亲属被海瑞抓起来了，要判刑，请客送礼的，忙得不亦乐乎！在这个紧急关头，这些来来往往的人员中，不乏肩负他和张居正联络使命的人，就叫他们联络员吧！

那么，事实是不是像张居正通报给徐阶的那样呢？要说高拱对徐阶没有怨恨，是不可能的；说高拱没有一丝一毫的报复心理，似乎也不是事实。

但事实是，高拱一到首都，就发现形势不对，谣言太多、人心惶惶，有些风声鹤唳的味道。为什么会如此，高拱并不知道。但是，这种情况，是高拱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不得不公开表态说，徐老乃高某的旧恩，当年，高某的每一次提拔，特别是当礼部部长、足登

政府，都是徐老一力引荐的；后来虽然因为一些事情闹点小矛盾，然则在高某看来，不足结怨，高某一切忘却！而且经过近三年的反思，高某决心洗心涤虑，与诸君同心同德，治理国家！这席公开谈话，发挥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可是，安心的人中，不包括徐阶。因为，张居正通报给他的消息是：学生一再在姓高那里为老师说话，三番五次规劝他；学生又在公开场合呼吁姓高的“忘怨布公”，以给他施加压力。所以姓高的才不得不稍微表示出和解的态度。但是，这不是他的真心，他是决计要报复的！当然，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为我师调停，凡力所能及的，自不待嘱，以报深恩于万一！

我判断，张居正不会以写信的方式通报这些，他的信从来都是很隐晦、不直接涉及人事和热点问题评论类的话题的。这些话应该是通过“联络员”口头转达的。

得到这个消息的徐阶，一点也不敢怠慢，急忙派人偷偷拜访张居正，研究对策。当然，顺带的，徐阶这位细心的老师，也不忘大力资助一下这位家庭负担（上有父母，下有七子）很重的学生。资助嘛，老师资助学生，也说得过去，况且人不知鬼不觉的，张居正是笑纳了。

那么调停呢？张居正说要在高拱那里调停，或许是真的。他此后也确实在表面上做了。但是，张居正做还是不做，怎么做，不是取决于该不该做，而是取决于他认为是否是恰当的时机。换言之，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准则来权衡，有的时候不仅不能真的调停，还要再煽点风点些火。